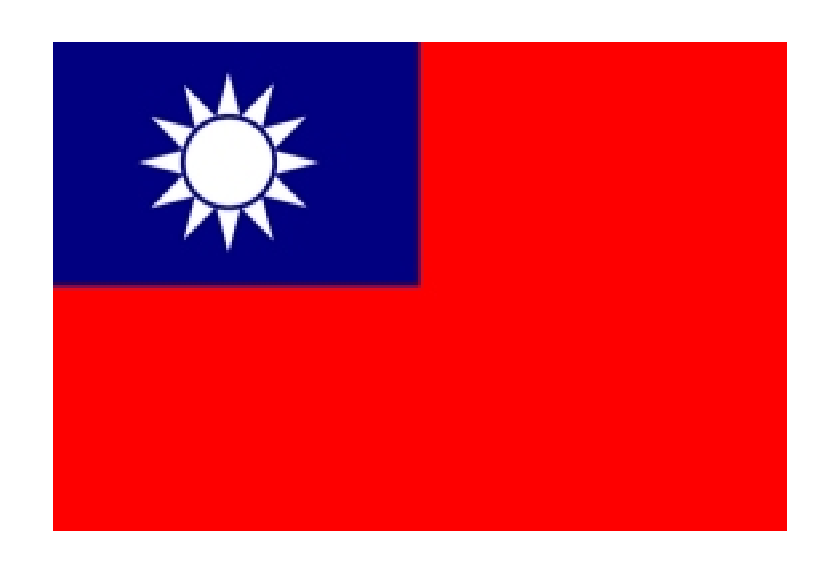


父親的憾恨
一九四六年春夏間國共第一次「四年街會戰」之前因後果及其重大影響
白先勇著

父親的憾恨

一九四六年春夏間國共第一次「四平街會戰」之前因後果及其重大影響



前言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展開鬥爭，搶奪接收淪陷區。雙方主要的軍事衝突，首先啟端於東北。由於東北在國防戰略、地緣政治、工業經濟以及歷史傳統上，對全國甚至整個亞洲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很自然的，東北便成為戰後國共鬥爭勢在必得的首要目標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之間，國共雙方軍隊，精銳盡出，在東北中長鐵路上的重鎮四平街，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戰爭。這是戰後國共兩軍為了爭奪東北第一次主力會戰，對於東北得失。以及整體內戰，關係至鉅。會戰在四平街持久拉鋸不下，雙方攻守最激烈的時刻，五月十七日父親奉蔣中正主席之命，飛往東北督戰。當時父親已發表為首任國防部長，並將於六月一日就職。父親赴前線督飭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並其部下新六軍、新一軍、七十一軍，三天內攻下四平街，並繼續往長春、永吉進攻。林彪部隊十萬餘人大敗，潰不成軍，往松花江北岸哈爾濱倉皇撤退。此時馬歇爾正在南京代表美國政府調停國共內戰，向蔣中正施壓停戰。在此關鍵時刻，父親飛回南京向蔣中正報告戰果，並力主國軍應不顧一切，乘勝追擊，收復北滿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徹底肅清東北共軍。蔣氏基於國內外種種複雜原因，始終未能採納父親此一關係東北國共戰爭勝負的重大建議，於六月六日，片面下令停戰。時國軍孫立人所率之新一軍，已追過松花江北岸，抵達雙城，離哈爾濱不足一百公里，中共中央大為震動，毛澤東下令林彪，準備棄守哈爾濱。此次停戰，遂予林彪部隊喘息機會，整軍反撲，東北形勢，自此逆轉，後東北淪失，乃影響整體國共內戰。

東北舉足輕重的地理位置及複雜多變的歷史傳統

東北地區，幅員遼闊，南起旅順大連，北至漠河，東起混同江，西至貝而斯池，約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之廣大土地。東北自然資源得天獨厚，舉凡煤、鐵、金沙、銀礦、鎂土產量或藏量，莫不富甲全國，石油、水力電源，均極豐沛，又因氣候雨量適當，農業發達、牧畜鼎盛，是中國自然條件最優厚的一個區域，因有「中國的生命線」之稱。自「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後，處心積慮，發展東北重工業，以做為侵略中國及亞洲的基礎。戰後據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調查的報告，德、日敗亡，中國東北在當時繼美、蘇、英之後，列為世界上第四大工業區①。戰後東北國際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見。

東北又因地理位置居於中國邊防要衝，綿長的邊界與外蒙、蘇俄遠東部份、及朝鮮半島毗連，隔海與日本對峙，地緣政治異常複雜。以中俄邊界為例，西起滿洲里東至圖們江口，蘇俄在遠東地區領土，對我東北形成一大弧形包圍圈。赤塔、海蘭泡、伯力、海參崴，乃俄國包圍東北四大軍略據點。以軍事觀點來說，蘇俄領土處於外線，我國東北則處於內線。蘇俄軍隊入侵東北，甚為便捷，抗戰末期，日本投降前夕，俄軍對日宣戰即從各軍事據點一齊發動，長驅直入東北，日軍窮於應付，數日內即遭擊潰。

東北為華北的自然屏障，彼此唇齒相依。自古以來，中國中原王朝的政府，對於東北（古遼東）的邊防問題，莫不投以最大關注。由秦漢至隋唐，經略遼東，一直是中原王朝政府軍事、政治、以及外交上的優先考慮。隋唐時期，隋煬帝、唐太宗且先後率大軍御駕親征高麗，可見得中國皇帝對遼東地區新興民族的威脅，是如何的敏感。十二世紀，女真族興起於東北的中北部，建立金王朝，一舉南下入侵中原而滅北宋，統治中國北部一百多年。有明一代，東北邊害，仍舊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明太祖朱元璋甫一開國便遣二十萬大軍出師東北，征服遼東。可是至十七世紀，女真族的後代再度崛起，乘着晚明政府積弱腐敗，中原動亂，大舉入關，消滅了朱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國，統治中國達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綜觀中國古代歷史，東北與中原互動關係，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東北的得失，往往直接關係中原政權的安危。東北新興民族的軍隊，一旦破關南下，便是中原漢族政府搖搖欲墜的時刻。東北資源豐饒，戰略位置險要，一旦落於敵對勢力之手，便可用來做為侵略中國本土的根據基地。

俄國自十七世紀推行「東進」政策以來，對中國東北地區一直虎視眈眈。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清政府

弱點畢露，俄國乃乘機大舉鯨吞我東北土地，脅迫清政府訂立一連串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瑷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將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廣大的土地掠奪而去。自此東北版圖殘破，俄國勢力侵入東亞。同時，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亦開始了「北進」政策。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訂立「馬關條約」，日本勢力由此進入朝鮮半島，積極展開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東北此後，便成為了國際勢力競爭的角力場。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竟是在中國的領土東北開火的。俄國戰敗，日本取而代之，遂成為左右東北的主要外國勢力。

東北是中國的生命線，東北亦是中國的火藥庫，二十世紀中國翻天覆地的戰爭、革命都是在東北引爆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在瀋陽爆發，日本佔領東北後，便以東北為根據地，向中國發動了八年侵略戰爭。日本戰敗，接踵而來的國共內戰，恰恰又是以東北的爭奪戰作為序幕展開。這絕非歷史巧合，而的確是東北國防戰略及天然物質超乎尋常的重要性，決定它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歷年來國共雙方政府、以及中外學者；檢討國共內戰的勝敗原因，莫不認為，東北的得失，對國共內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間國共兩軍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則是一場關鍵性的戰役。其前因後果及經過情形，值得詳細研究。

戰後東北的國際形勢——美蘇之間的勢力競爭

戰後東北不僅為國共相爭的第一目標，亦是美國與蘇俄兩霸互相較勁的比賽場所，事實上是四組力量合縱連橫的複雜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為了逼使日軍早日投降，以減低美軍在遠東戰區的傷亡，不惜犧牲中國領土主權，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與蘇俄訂立雅爾達密約，以換取蘇俄向日宣戰出兵。美國估計日本海軍雖被擊敗，但日本陸軍戰鬥力仍可觀，尤其是東北七十八萬關東軍，是一股強大力量，蘇俄參戰，乃屬必要。雅爾達條約除了迫使中國承認外蒙獨立外，其他多為有關蘇俄在東北的權利；開大連為國際商港、租借旅順為俄海軍基地、合營中長鐵路等。八月六日，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日本投降在即；於是蘇俄趕緊於八日對日宣戰，次日，蘇軍一百五十萬人自中蘇、中蒙、中韓邊境，出兵東北，關東軍不戰而降，蘇俄勢力又再度輕易侵入中國東北領土，對國共接收東北的爭奪戰，產生了鉅大影響。東北對蘇俄的利益既是經濟性的亦是戰略國防的。二次大戰，蘇俄工業遭到德軍嚴重破壞，蘇俄掠奪東北價值二十億美元的工業設備及原料，以做補償。歐戰結束蘇俄勢力席捲東歐，美蘇兩國形成尖銳對峙，在歐洲大陸各處交鋒；同時兩國爭奪霸權亦在亞洲迅速展開。日本戰敗，美軍佔領日本，不讓蘇俄插手，蘇俄已感芒刺在背。在國防上，東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蘇俄遠東區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國及親美勢力在東北生根立足，是蘇俄戰後遠東政策的第一要務。因此當美軍協助國民黨軍隊海空運輸到東北，蘇俄便處處作梗，不讓國軍順利登陸，延誤國軍進佔東北。蘇俄阻礙國軍接收，而讓共軍在此緊要階段，搶先一步，立足東北，在時間上佔了機先，對其日後勝利，是大有幫助的。而其軍從蘇俄手中獲得關東軍的武器軍備，當然又是另一項蘇俄的「貢獻」了。

戰後美國對遠東的策略，首要目標仍是在於防止蘇俄勢力擴張，代替日本，獨霸東亞。但傳統上美國外交政策重歐輕亞，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向日宣戰，出兵協助中國，是因為日本先偷襲珍珠港，美國還擊，出於被動。事實上美國政府一向對遣派軍隊至亞洲大陸作戰視為畏途，如何避免出兵中國而又能阻止蘇俄勢力擴張遠東，這便是美國戰後的一大難題。當時國共雙方，劍拔弩張，軍事衝突一觸即發，尤其日本甫投降，共軍已水陸兼程進兵東北，而雅爾達密約美國引狼入室，蘇俄軍隊在東北形成尾大不掉，東北形勢急迫，美國政府是有認識的。但當時杜魯門政府打如意算盤，美國一方面積極協助國軍進佔東北、華北，另一方面卻又派馬歇爾到中國調停國共內戰，向國民黨施壓，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這種兩面不討好的政

策當然註定失敗。馬歇爾在中國調停一年，無功而返。當時對中國問題了解最深的是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他估計國民黨軍隊並無能力單獨接收東北，曾向美國政府參謀總部建議派遣美軍七個師進駐東北，協助國軍，對抗蘇俄，但為美國政府所拒②。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線是，美國絕對避免直接出兵干預中國內戰。蘇俄軍隊在東北為所欲為，而美國卻劃地自限，不肯介入過深，以免捲進國共內戰旋渦，被迫與蘇俄在遠東兵戎相見。國民黨政府戰後接收東北，可謂舉步維艱，既遭蘇俄作梗於先，又受掣於美國調停，國際形勢極為不利。

共軍闖關東北

中共深刻認識到東北在戰後國共鬥爭中，有決定彼此勝敗的重要性。除了經濟以外，戰略地形上東北對中共尤其緊要。如果中共能控制東北，不但可以背靠蘇聯、外蒙、北韓等國際共產勢力，除去後顧之憂，而且可以與華北各「解放區」連成一片，突破長期被國民黨包圍的狀態，使中共軍隊有一個戰略的後方。如果東北被國民黨所控制，就會切斷華北「解放區」與蘇聯、外蒙、北韓的聯擊，使華北地區處於南北夾擊的地位，對國共鬥爭極為不利。爭奪東北，是中共戰後第一要務，中共全力以赴。

遠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已經提出了爭取東北的戰略任務，指出「如果取得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八月九日，蘇俄進軍東北，國際形勢發展對中共大為有利，兩天後，朱德於十一日接連發佈七道命令，令各地共軍出發進佔淪陷區，接受日本投降。其中第二道「為了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並準備接受日滿偽軍投降」：

一、原東北軍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

二、原東北軍張學思所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

三、原東北軍萬毅所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

四、現在河北、熱河、遼寧邊境李運昌所部，即日向遼寧、古林出發。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隊八路軍及新四軍的一些骨幹，馬上開動，沿着長城內外以及山東、蘇北，日夜兼程，分水陸兩路源源抵達東北；

九月初，冀熱遼軍區曾克林部到達瀋陽、本溪。同區李運昌部，到達山海關、錦州。

十月上旬，山東蕭華部到達安東，沙克、萬毅、呂正操各部抵達南滿各地。

十月下旬，吳克華、楊國夫、劉立人等各率部由山東紛紛到達山海關至瀋陽一帶。

一月，羅榮桓、黃克誠等由山東、蘇北，率大隊人馬到達安東、瀋陽地區及錦洲一帶。黃永勝率部到

達熱河。

由九月至十一月，短短三個月間，中共各路部隊，先後到達東北，有十一萬人。中共中央又從各地抽調黨政軍幹部二萬多人，一同進入東北。

同時中共中央制定了幾項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九月十五日，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為東北局書記，委員有陳雲、伍修壱、葉季壯、林楓、彭真等即刻飛東北，二十一日在瀋陽召開會議，宣佈東北局成立。此後陸續派往東北的高級幹部又有高崗、張聞天、李富春等，先後到達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竟達二十人之眾。政治局委員就佔有四名。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為總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員，羅榮桓任副政治委員，周保中、呂正操任副總司令；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稱為「東北民主聯軍」，除八路軍、新四軍外，並包括東北舊有的「東北抗日聯軍」、「民主自衛軍」、「自治軍」。

由此，在甚短期間，中共在東北便建立了掌握黨政軍的初期架構，展開工作。

中共能夠如此迅速進軍東北，一來由於抗戰期間，中共部隊在華北、冀、熱以及山東、蘇北一帶常年打游擊已奠下根基，由這些地區進軍東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搶奪東北志在必得，一聲令下，劍及履及，其果斷決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於蘇俄在東北到底幫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爭議。但至少中共部隊初到東北，蘇軍沒有像對待國軍那樣百般刁難，則是不爭之事實。國共兩軍爭奪東北，共軍搶得了機先。

中共對進軍東北的人事佈署是下了大本錢的，黨政軍菁英盡出。軍事上林彪是當時共軍中頭一號戰將，其他如羅榮桓、黃克誠、蕭華也是共軍將領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啟用東北人士，張學思（張學良弟弟）、呂正操、萬毅等率領的老東北軍，返回東北故鄉有一定的號召力。東北局的彭真、陳雲後來又加高崗、張聞天，等人更是中共黨內的核心人物，連長期居留俄國走國際路線的李立三也回轉東北，參加工作。中共對東北下了如此大的賭注，連羅榮桓自己都說：「如果還搞不好，那就該打屁股。」③

中共軍隊幹部初入東北，展開工作並不完全順利。長期以來，日偽統治時代，對於中共在東北的地下游擊抗日工作採取嚴厲鎮壓，周保中等人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犧牲很大，一九四二年後被迫退入蘇聯境內。不同於華北、蘇北等地，中共的勢力，在東北民間並未生根，東北人民當時都只認同國民黨的中央

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對於中共不甚了解。中共軍隊開始並未獲得東北人民支持，初到東北，相當艱苦。黃克誠十一月二十六日打電報給毛澤東抱怨，共軍「七無」：

「無黨（組織），無群眾（支持），無政權，無糧食，無經費，無醫藥，無衣服鞋襪等。部隊士氣受到極大影響……」④

共軍在東北無錢無糧，十分擾民，黃克誠的新四軍第三師到東北已一月，僅領到滿洲偽幣二百萬元，夠伙食十六天用，他十二月十七日打給軍委的電報說⑤：

「對人民強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邊幣，造成物價飛漲，商店關門，糧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糧外，其餘到一處吃一處，吃空燒盡，有如蝗蟲，人民怨聲載道。」

蘇聯紅軍在東北強橫霸道，巧取豪奪，東北人民極為反感，把共產份子視為一丘之貉。加上中共軍隊初到東北，衣着襤褸，給東北人民的印象當然不會太好。那個時候，東北人民對中共是不信任的。

中共部隊進關初期，本身也有不少問題：第一是逃兵問題；九月七日，萬毅給軍委的電報⑥：

「部隊採取逐次動員，但逃亡仍嚴重，僅昨夜即逃副排長以下八十餘。」

黃克誠的新四軍第三師共三萬二千五百人，十一月十五日給「軍委林彭」的電報中說：「沿途逃亡掉隊病號約三千人。」⑦

其次中共部隊組成份子良莠不齊，第三縱隊副司令員韓先楚如此批評⑧：

「進入東北之後，一些偽滿散兵游勇和雜色團伙混入我軍，有些以『明當八路，暗投中央』為目的的組織也鑽了進來。所以，雖然出現參軍高潮，但真正工農群眾所佔的比例不大；部隊發展雖很快，但大量新成份，實際上是不鞏固和缺乏戰鬥力的。」

中共部隊進入東北，蘇聯紅軍雖然開了方便之門，沒有刻意阻止，但紅軍對待共軍，也並非完全友善的。據黃克誠、羅榮桓等人的回憶⑨，他們的部隊初到東北，曾受過紅軍不少氣。蘇俄藉口與國民政府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東北的大城須交到國民黨手上，中共部隊欲進駐瀋陽，也被紅軍趕了出去。蘇

俄原來答應將日偽留在瀋陽的大批武器移交給中共，後來並未實踐諾言。不過羅榮桓承認，一些中小城市的日偽武器還是交到了共軍手中，「改善了裝備，保證了戰爭初期的需要。」

斯大林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一向輕視，他曾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譏稱中共為「奶油共產黨」(Margarinc Communists)。斯大林對中共戰後武裝奪權的勝算，起初並不看好，當時國軍的人數軍備遠超過共軍，又有美國援助，看起來國民黨遠佔優勢。斯大林老謀深算，對國共施展的是兩面外交，並非完全一邊倒向中共，國共相爭，斯大林是坐山看虎鬥，伺機從中取利。在東北，蘇俄對中共部隊，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搶先進軍東北，天時地利人和雖然都佔了便宜，但遭遇到的問題及困難亦不少。

國軍進軍關外

國民黨政府當然亦深知戰後接收東北的重要性與複雜性。不同於其他淪陷區，國民政府接收東北，需從蘇軍手中轉移，而非從投降日軍直接接收，因此是外交交涉，牽動國際勢力。而戰後大批共軍已先抵東北，國軍進軍東北，勢必引起國共軍事衝突，接收東北，亦是軍事行動。

日本投降前後，重慶政府軍政要員，曾為戰後東北接收問題，從各種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議。一九四五年九月初旬，立法院長戴傳賢曾邀何應欽及父親等人召開會議，討論東北接收的方針。父親認為欲保東北必須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須先收熱、察。萬一必須大軍出關，亦只宜先駐瀋陽：俟包（頭）、綏（遠）解圍，錦（州）、承（德）肅清、再收長（春）、哈（爾濱），否則軍機補給、士兵寒衣，均生困難⑩。父親從軍事戰略的眼光來看東北、華北的接收，東北的確補給線過長，國軍的力量，同時佔領東北、華北，力有不逮；部隊入東北，孤軍深入，乃兵家大忌，故應先鞏固華北，步步為營，再作北上打算。父親曾任軍訓部長八年，對國軍部隊的實力，瞭若指掌。父親的看法，與魏德曼不謀而合。魏德曼亦認為國軍單獨沒有力量同時佔領華北又北上接收東北。他向蔣中正建議，政府應立即派遣軍政精英人員，至長城以南的華北地區，先鞏固其他政權。他並向蔣氏建議：將東北問題國際化，邀請美、英、法、俄，與中國暫時共管東北，以監控蘇俄在東北單獨行動⑪。蔣氏亦深知東北國際形勢的複雜，曾認真考慮過魏德曼的建議。他在〈蘇俄在中國〉中，對東北接收問題，作此痛切檢討：

「東北的安危，換句話說，就是東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個國際安全有關的問題。當時中國既不能單獨解決，也非直接對俄談判所能解決，則我們應該採取停止接收的決策，一面將我們的部隊集中平津，堅守榆關，而以錦州為前返據點，一面將東北問題提出聯合國公斷，同時公諸世界輿論，採蘇俄以應負之責任。如此則我政府在國內有充分實力，戡定中共的判亂，控制華北的全局，而以東北問題提出國際交涉，暴露蘇俄獨佔東北的狂暴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的野心計劃。

然而我們決策之後，卻受了國內和國際各種牽制，不能堅持到底，而又轉向蘇俄直接談判，同時更將我們國軍精銳的主力調赴東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調度自如，爭取主動；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⑫

蔣氏在此檢討認為國軍應先集中平津，也就是父親當年的建議。

國民政府為處理接收東北事宜，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常會聯合通過「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綱要」，規定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及政治、經濟兩委員會，劃東北為九省，先後任命熊世輝為行營主任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聿明為保安司令長官，此外並任蔣經國為外交特派員。

國民政府當時計劃分外交、行政、軍事三方面進行接收東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當初國民政府委曲求全與蘇俄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即希冀以外交談判與蘇俄交涉接收東北，而蔣中正任命蔣經國為外交特派員，足見國民政府對中蘇談判，寄望之殷。

十月十二日，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抵長春，設立東北行營，並開始與遠東俄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Rodin Y. Malinovshy)展開一連串崎嶇曲折的談判。中國方面，談判重點在於蘇俄撤兵日程以及中國部隊進駐東北的問題。中國要求部隊在大連、營口、葫蘆島安東港上岸。但蘇俄堅稱大連乃自由港，中國軍隊不得使用，而營口、葫蘆島等港，蘇俄則稱情況不明，無法保證國軍安全。後國軍部隊運抵葫蘆島港口，果遭共軍射擊，只得改向秦皇島登陸。至於撤軍日期，蘇俄也一再更改，有意拖延。蘇俄阻撓中國接收的主要原因是在撤軍前，向中國政府討價還價，恢復沙俄時代在東北的經濟特權。

十月底，斯大林準備與蔣中正直接商談，邀請蔣經國先往。十二月廿五日，蔣經國以蔣中正主席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與斯大林兩次會晤。斯大林提出的談判重點為堅決反對美國勢力進入東北，要求中國採取不偏不倚獨立政策，如將美國勢力排出，由中俄合辦東北工業三十年，可命中共服從蔣主席的領導。斯大林並提議與蔣中正在莫斯科或中俄邊境會晤。蔣中正對斯大林反覆無常心生疑懼，又怕斯大林離開中美關係之計，沒有接受邀請。

中蘇談判膠着而共軍趁機源源上道進入東北，國民政府鑑於外交接收失敗，而派往接收的行政人員，又處處受到共軍威脅，乃決定下令國部隊硬行闖關，開始軍事接收，國共軍事衝突，在關外日漸擴大。

自一九四五年末至四六年初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前後抵達東北的國軍部隊如下列次序：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軍，軍長石覺。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

一九四六年一月，新六軍，軍長廖耀湘。

同年二月，新一軍，軍長孫立人。

三月，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

四、五月，六十軍，軍長曾澤生。

五月，九十三軍，軍長盧睿泉。

此外，尚有青年軍的二零七師，師長羅又倫。

「四平街會戰」之前，國軍出關共七個軍，約二十八萬人，由美軍協助：從越南、緬甸、以及中國西南邊域以海空運到東北。

杜聿明任命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後，便將司令部指揮所設在秦皇島，指揮國軍部隊進佔東北。由於共軍捷足先登，南滿的中小城市多被佔領，國軍入東北，是一站一站硬打進去的。十三軍及五十二軍先抵秦皇島，因十三軍乃全部美械裝備，火力強大，五十二軍是半美械裝備，火力中等，杜聿明指揮這兩個軍，自十一月中旬從山海關沿北寧鐵路北上，十一月二十六日，進據南滿重鎮錦州。其間林彪部隊遠道跋涉，十分疲勞，一時戰鬥力尚未恢復，而共軍的裝備遠不如國軍，且打且退。國軍初入東北，尚稱順利。韓先楚也承認，國民黨軍「最初進攻的兵力，雖然不過兩個軍，但戰鬥能力卻優於我軍。」⑬

國軍攻佔錦州之後，繼續往北擴展，佔領北鎮、黑山、義縣等地，同時往熱河方向錦承鐵路西進，攻進北票、朝陽。一九四六年一月，國軍已佔領熱河東部及遼寧西部的廣大地區。二月，十三軍八十九師，向法庫冒進，與共軍新四軍三師激戰於秀水河，八十九師折損一團人，是國軍出關後，第一次受挫。但同時國軍第六軍等其他五個軍，已陸續進入東北，國軍勢力大增，關外國共戰爭，乃轉劇烈。

蘇俄向國民政府索取東北經濟利益不得逞，國民黨內由CC派主導的反蘇運動在各大城市爆發，中蘇關係惡化，國際上美國領頭向蘇俄施展壓力。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起，蘇俄乃開始從東部各地撤兵，於是國共部隊便積極展開爭奪東部各大小城市。三月十三日，國軍五十二軍進駐瀋陽，隨即配合新一軍、新六軍以瀋陽外為中心，向瀋陽以南、以東、以北繼續進軍，從三月下旬至四月初，佔領撫順、鐵嶺、遼陽、

鞍山、營口等南滿重要城市。而共軍早已深入北滿，又得蘇軍撤退時之暗助，紛紛進佔北滿以及中長鐵路上之大小城鎮，三月十八日，共軍進佔四平街，四月十八日進佔長春，一週後，又佔領哈爾濱，其他如齊齊哈爾、佳木斯等亦多落入共軍手中。國共兩軍，南北對峙，關外大戰，一觸即發。而兩軍下一個攻防的目標，即為位於瀋陽及長春之間，中長路上之重鎮四平街。於是歷時一月，從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國共關外第一次主力戰「四平街會戰」由此展開。

馬歇爾調停

馬歇爾奉杜魯門總統之命：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日抵華，調停國共內戰，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調停失敗離華，其間年餘，亦正是東北國共之爭、國軍由初期軍事優勢開始逆轉，成為劣勢之時。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東北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國軍大勝，馬歇爾不斷向蔣中正施壓，敦促東北國軍停止追擊。其後，蔣中正六月六日下第二次停戰令：遂讓林彪潰敗之軍，得以喘息，日後整軍反撲，擊敗國軍。第三次停戰，對東北戰局，影響至鉅。

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是中美關係史上備受爭議的一件事情。國民黨固然歸咎馬歇爾處處掣肘、遂令國軍坐失良機。國共鬥爭失敗，國民黨責怪美國援助不力，馬歇爾被列為罪魁禍首。而馬歇爾調停期間，中共充份施展「會議戰術」，邊談邊打，瓦解國軍士氣，談判桌上佔盡上風，但對馬歇爾亦不領情，譴責他偏袒國民黨，給國民黨美援，替國民黨運輸軍隊。最後馬歇爾弄得兩面不是人、鎩羽而歸。韓戰興起，美國國會追究「誰失去中國」的責任，馬歇爾又被當箭耙，受到猛烈攻擊。這位二次大戰傑出的美國將領，大概萬沒料到，到中國調停國共內戰竟變成他一生輝煌事業的「滑鐵盧」。

美國杜魯門政府派遣馬歇爾至中國調處國共內戰，其實一開始便注定了失敗的命運。首先是美國政府及馬歇爾本人對中國以及中共的認知有偏差。美國傳統重歐輕亞的政策，低估了中國戰略的重要性，認為美國不值得為中國一戰，美國對華政策的底線，即是絕不出兵干與中國內戰。馬歇爾本人亦認為「中國並不具備天然資源及工業基礎，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不可能變為頭等軍事強國。」⑭ 因此，他認為即使中共得勝執政，中國對美國暫時亦不會構成威脅。直到韓戰爆發，美軍在韓國戰場上嚐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厲害，損失重大，美國才第一次警覺到中共這個對手，不好相與。

由於認知偏差，美國當時的對華政策當然便有了嚴重缺失。馬歇爾奉命使華，主要任務是強迫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組織聯合政府，以政治協商談判，消弭國共軍事衝突。然而對於國共鬥爭史稍有研究的人，便知道這兩黨絕無組織聯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馬歇爾組織聯合政府頭一宗要務是欲將中共軍隊國家化，將中共部隊編入國軍建制，這無異要中共繳械，是與虎謀皮。日本甫投降，共軍總司令朱德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共軍往東北華北佔領淪陷地區，軍事奪權，是中共的既定政策。至於談判，毛澤東說得最清楚

不過：「和談是另一次戰爭的政治準備。」馬歇爾調停初期，中共軍事還未佔上風，所以願以談判爭取時間。談判桌上的周恩來，與東北戰場上的共軍統帥林彪遙相呼應，中共軍事失利，談判姿態隨即軟化，一旦得利，姿態馬上轉為強硬、一鬆一緊，政治談判與軍事衝突交相運用，在馬歇爾的調停期間，中共的「會議戰術」，運用得出神入化。馬歇爾面對周恩來這樣一個足智多謀的談判高手，在會議桌上，當然只有被牽着鼻子走的份。馬歇爾赴華調停，手中有一張王牌：美援。馬氏動輒以切斷美援威脅國民黨就範，停止軍事衝突與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當國民黨屢次不聽話的時候，一九四六年十月起為時八個月，馬氏果然下令禁運美國軍火到華。讓國軍吃是苦頭。但共軍卻不依賴美援，所以馬歇爾對中共並無拘束力，輪到中共公然違反談判協定時，馬歇爾卻無計可施，這乃是他調停失敗的癥結所在。魏德邁對馬歇爾赴華調停的任務，一開始就不看好，他對他的上司有這樣的批評：

「馬歇爾主要是一個軍人，他對國際鬥爭之複雜性所知有限，更昧於共產黨假仁心而行暴政之邪僻，尤有進者，馬氏奉命抵華之時，早已身心俱疲，對當時情況無法做出正確評估。」⑮

魏德曼的話說得很重，但頗中肯，馬歇爾的確對當時中國情況，缺乏深刻了解。一九四六年四月，馬歇爾回美述職後重返中國，二十一日竟向蔣中正呈遞備忘錄，宣稱擬以美國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⑯。當年蔣中正與史迪威翻臉，主要原因之一即為史氏擬以美國裝備供給共軍抗日。事實上，四月十八日，東北共軍違反停戰協定打入長春，馬歇爾竟會在此時對蔣中正提出這樣不可思議的建議。馬歇爾竟會在此時對的心結心病如此缺乏認識，他調停國共內戰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一次「四平街會戰」——「把四平變成『馬德里』」

四平街是當時遼北省的省會，人口八萬，位於中長、四洮、四梅鐵路之交點，為東北交通樞紐，工業及軍事之重鎮。其東北郊山巒重疊，西南郊河流縱橫，形勢險要，又因其位處中長鐵路上瀋陽與長春之間，是南北滿通衢的咽喉，歷來為戰略上必爭之地。

共軍自從出關以來，一直到「四平街會戰」（中共稱為「四平保衛戰」）以前，其主要戰略是「且戰且退」，與國軍交戰採取游擊戰、運動戰、避免與國軍正面衝突，不作無謂犧牲。蓋因共軍初出關外，尚未建立根據地、群眾基礎不穩固、軍隊的裝備亦不充足，面對美式機械裝備的國軍，軍火及戰鬥力均佔下風，因此山海關、錦州等段，共軍皆主動棄守、且戰且退。可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共軍進佔四平街後，中共中央卻一反往常，改變戰略，決定保衛四平街，在四平街及本溪各結集十萬大軍，準備與國軍主力一決勝負。毛澤東下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爭」⑰。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毛澤東電林彪並東北局彭真⑱，對四平、本溪保衛戰作了重要指示：認為「集中六個旅在四平地區殲滅敵人，非常正確。」「黨內如有動搖情緒，那怕是微小的，均須堅決克服。」，「本溪方面、亦望集中兵力，殲滅進攻之敵一個師」。毛澤東認為「上述兩仗如能打勝，東北局面即可好轉。」，為了達成目的，中共中央毛澤東不惜犧牲，孤注一擲，「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有決心付出此項代價，才能打得出新局面。」促使毛澤東下如此決心，不惜犧牲數萬軍隊與國軍在四平街攤牌一戰，當然有其當時複雜背景原因。「四平街會戰」前夕，共軍已速增至三十萬，兵力大為加強。蘇軍驟然撤退，共軍得到暗助，紛紛順利進佔四平街、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重要城市。因為四平街之戰略位置險要，欲保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必先固守四平。當時馬歇爾正返美國洽商美援問題，毛澤東估計馬氏回中國後，必加壓力，逼使國共東北停戰，毛打算在國共和談前，在四平街給予國軍迎頭痛擊，保住長春、哈爾濱等重鎮，以便在談判中獲取最大利益，因此倡導言在和平前，保衛四平乃「最後一戰」。同時毛澤東亦低估了國軍的作戰實力，他在同一電報中，對國軍如此分析：「國民黨現有之七個軍、包括九十四軍及姜鵬飛偽軍在內：此兩部或則不齊，或則無力；擬調各軍，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齊，且包括雲南龍部及其他次等部隊，大有文章可做。」可是毛澤東忽視了國軍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以及青年軍二零七師這些美式機械裝備訓練有素的軍隊堅強的戰鬥能力。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電林彪：

「堅守四平的指揮員、政工人員們：為和平民主，你們要堅守四平，甚為英勇，特傳令嘉獎。望你們再接再厲，堅守到最後勝利，把四平變成『馬德里』。」

會戰開始時，毛澤東信心十足，意興風發、滿以為在四平能重創國軍、使「四平保衛戰」像西班牙內戰，共和軍死守馬德里一般，蜚聲國際，令中外矚目。

但東北戰場上的共軍將領並非全都贊同毛澤東保衛四平的樂觀看法。首先「東北民主聯軍」統帥林彪在會戰前，對死守四平便有疑慮，四月十一日給中央電中，林彪對當前情勢作了如此判斷：

「我固守四平和奪取長春的可能性和東北和平迅速實現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軍方針似應以消滅敵人為主，而不以保衛城市，以免被迫作戰，其結果既不能保衛城市又損失了力量……」⑲

林彪此時的看法其實十分正確，一向老成持重直言敢諫的新四軍將領黃克誠在會戰當中，還不斷向中央呼籲，棄守四平、長春。致中央五月十二日電中，他首先向毛澤東陳述中共部隊傷亡耗損的實情：

「由關內進入東北之部隊，經幾次大戰鬥，戰鬥人員消耗已達一半，連、排、班幹部消耗則達一半以上。目前雖尚能補充一部新兵，但戰鬥力已減弱。」

黃克誠認為：

「四平堅守有極大困難，四平不守，長春亦難確保。」

毛澤東不理睬黃克誠，也不回電，卻一直電令林彪「堅守四平」。四月十八日，共軍進佔長春，林彪頗受鼓舞，林彪四月十九日電中央⑳，向毛澤東表示堅守四平的決心：

「我守軍決戰至最後一人。」

林彪先前的顧慮一掃而空，跟隨毛澤東一齊冒進，準備破釜沉舟，「死守四平」。

林彪親自統率黃克誠、李富春、萬毅、周保中、呂正操各部共十四個師十萬餘人，廣築工事，以四平市區為中心，組成一條東西蜿蜒百餘里的防線，決心把「四平變成『馬德里』」。

中央軍王牌盡出

國民黨政府這一邊對四平街亦是志在必得。國軍自出關後，向北進展遲緩，雖然與共軍衝突不斷，但都是零星小仗，未曾打過主力大戰。國軍最初出關只有兩個軍，至「四平街會戰」前夕，已增至七個軍暨青年軍二零七師共二十八萬人，兵力驟增，與共軍人數相差不遠。起先蘇聯紅軍佔領東北，等於是共軍的保護傘，國軍有所顧忌，避免與共軍大打出手，自三月中後，蘇聯紅軍開始逐漸撤退，而共軍乃乘機進佔各大城，國共兩軍短兵相接，大戰已不可避免。

當初馬歇爾來華調停，於一月十日，達成了國共第一個停戰協定。一月十三日起，「國軍及共產黨領下之部隊，立即停止一切戰鬥行動」，但協定有一條重要的??書，停戰令「對於政府軍隊之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並不影響」。其實第一次停戰令國共雙方都沒有嚴格遵守，尤其是關外軍事衝突一直沒有停過，但四月十八日，馬歇爾回轉中國的同一天，共軍三萬餘攻入長春，與國軍先遣部隊保警第二、第四總隊發生巷戰，保警總隊不支，被共軍消滅一萬餘人㉑，長春市長被俘。這對國軍不啻公然挑釁，連美國政府不得不宣稱，共軍攻佔長春是「公然違反停戰協定」㉒ ，這就給了國軍正當理由與共軍正式開戰了。本來國軍出關後，便伺機與共軍打一場主力戰，一決勝負，共軍集結大軍死守四平，正好給了國軍一個殲滅敵人主力的機會。

四月二十一日，蔣中正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指示「四平街會戰」要領㉓：

「(一) 四平街會戰，國軍應徹底集中兵力，一舉擊破『共軍』之主力。

(二)四平街會議後，視戰果及甲軍情況，趁勢收復公主嶺、長春、遼源或在四平街方面暫取守勢，抽出有力一部先擊破張學思部，收復本溪湖。」

蔣中正與毛澤東對四平街之攻守戰下了一樣大的決心，二人最後的目標都在長春。

四月二十三日，蔣中正召見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驤，聽取東北軍事情況報告，並面授機宜，同日蔣氏電杜聿明，指示四平街會戰應採陸空聯合作戰 ㉔:

「此次前進應特重空軍充分之準備與陸軍之切實聯繫，為解決日前戰局之唯一要旨，無論對南對北，各

陣地皆應集中空軍全力用於一點，俾我陸軍奏效迅速也。」

同日又電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東北作戰，「我空軍應全力以赴之。」

「四平街會戰」，國軍空軍傾巢而出，發揮了鉅大效果，在本溪重創共軍。陸軍方面，國軍也可謂精銳盡出，七個軍有五個軍是美式機械裝備，其中新一軍、新六軍是國軍五大主力中之兩個主力。新一軍軍長孫立人，畢業於美國維珍尼亞軍事學院，為國軍將領中受過最完整現代軍事教育的將領之一，抗戰其間，以中國「遠征軍」出征緬甸，率新三十八師，於仁安羌一役以少擊眾，打敗日軍，解救被困英軍，蜚聲國際。魏德邁對孫立人推崇備至，認為孫立人是他所接觸過的中國將領中，最傑出的軍人，他稱讚孫「有統御的特質，通曉現代軍事戰術與技巧。」㉕ 新一軍在抗戰其間，曾在印度藍伽接受史提威整訓計劃，受過嚴格之美軍訓練，武器裝備全由美國供給，是中國一支最現代化之軍隊，反攻緬北諸役，戰果輝煌。新六軍軍長廖耀湘畢業於黃埔六期，後又保送至法國聖賽爾軍校深造，資歷與孫立人相當，是國軍中少數受過嚴格完整現代軍事教育之將領。抗戰期間參加「崑崙關大戰」、反攻緬北等戰役，戰績彪炳，曾獲國民政府頒授青天白日勛章，所率新六軍與新一軍並駕齊驅，乃國民黨中央軍中兩支「王牌軍」，是「四平街會戰」中的主力。另一支攻打四平的部隊第七十一軍亦非弱者，軍長陳明仁黃埔一期，驍勇善戰，是國軍中有名的猛將。陳明仁及所部第七十一軍抗戰期間反攻滇西，曾立大功，甚受盟軍贊譽。而統率此三個軍攻擊四平街之主將杜聿明，畢業於黃埔一期，更屬所謂「天子門生」，向為蔣中正所倚重。抗戰時期杜聿明曾任第五軍軍長，第五軍為當時國軍唯一機械化之部隊，杜氏以指揮「崑崙關大戰」，奮勇克敵，而名重一時。後又任中國遠征軍副司令長官，遠征緬甸，戰後蔣中正選拔杜聿明擔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之重任，亦可見對杜氏寄望之隆。

國軍出關，多由美軍軍艦及飛機直接運輸，並未像共軍經過艱苦長途跋涉。初出關時，國軍將士鬥志高昂，由山海關向北挺進、一直是採取攻勢，至「四平街會戰」前後，這一個階段可以說是東北國共戰爭中，國軍士氣最旺盛的時期。

攻打本溪

蔣中正鑒於馬歇爾由美返華後必然又將施壓令東北國共軍隊停戰，乃下令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限其四月二日前搶先攻佔四平街。國軍之所以遲遲未能一舉攻下四平，主要原因之一為共軍在本溪集結了十萬大軍，與防守四平之人數相當。本溪為遼南戰略重鎮，有「煤鐵之都」之稱，是瀋陽的門戶，共軍紮重兵於此，既可威脅瀋陽，又可牽制一部份國軍，令其不克北上。國軍欲全力攻下四平，必先解除本溪共軍的威脅，才能抽兵北進。此時杜聿明因病住院北平；熊式輝乃親自指揮攻打本溪，令第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指揮第二十五師由撫順出發，新六軍之第十四師由遼陽出發，分兩個縱隊於四月七日向本溪進攻。詎料第二十五師竟遭共軍集優勢兵力圍殲，損失一團人，師長劉世懋率部撤逃。第十四師亦損失重大。熊式輝原想邀功，第一次攻打本溪失敗，反而受辱，頗感苦惱。由於攻打本溪受挫，進攻四平亦呈膠着狀態。

四月十六日，杜聿明病癒返瀋陽，重新部署，加強五十二軍及新六軍，以二軍全軍部隊附七十一軍之第十八師，在空軍掩護下，於四月二十八日分兩路向本溪攻擊前進。經過強烈戰爭，國軍空軍以低空投擲美制殺傷力極強之「麵包籃」炸彈，共軍傷亡兩千多人㉖。五月七日，國軍攻下本溪。杜聿明如此評論此役：「本溪之共軍已被我軍擊潰，傷亡慘重，向連山關以南安東境內潰退。」㉗

本溪共軍威脅解除，杜聿明乃抽調新六軍北上，協助新??軍及第七十一軍，向四平街挺進。

進攻四平

當初三月十八日共軍佔領四平街後，國軍即奉命於三月下旬開始北上進攻四平，其進軍北上的部署如下：

以新一軍及第一九五師為中央兵團，由瀋陽沿中長鐵路攻擊前進，新六軍及第八十八師為右翼兵團，由本溪經西豊、平岡迂迴四平側背策應；第七十一軍（欠第八十八師）為左翼兵團，於秦皇島登陸後，由新民極法庫攻擊四平側背。

三月下旬至四月初，正是遼北地區化雪季節，沿途道路泥濘，國軍都是美式機械重裝備，軍炮運輸不便，又遭共軍節節抵抗，進展遲緩，一直打到三月二十七日，新一軍始進佔開原，四月四日進佔呂圖。同時左翼第七十一軍亦進佔法庫。四月十日前後，新一軍在空與炮兵的掩護下，向四平街攻擊，激戰數日，曾一度突入四平，因後續部隊支援不及時，卒被共軍擊退。十五日，第七十一軍第八十七師，孤軍冒進，在大洼遭共軍埋伏，第八十七師一團人被消滅。經此敗損，國軍攻勢頓挫，與共軍形成僵持局面。直至五月初，右翼新六軍將本溪共軍擊潰後，迅即移師北指，五月十三日，於開原集結，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乃重新調整部署，準備於十四日，開始對防守四平街之十萬餘共軍實行兩翼包圍迂迴攻擊。當日(十三日)，杜聿明下達進攻四平街命令㉘：

(一)本溪之共軍已被我軍擊潰，傷亡慘重，向連山關以南安東境內潰退。現我第六十軍一部及第五十二軍主力在營口、海城、連山關間佔領陣地搜索警戒中。

四平街之敵約三個縱隊，現在老爺嶺、四平街、舊四平及昌北以東趙家溝、任家屯一帶佔領陣地，頑強抵抗，與我新一軍及第七十一軍（欠第八十八師）對峙中。

共軍之一部約兩個縱隊，在中長路以東南下與我鐵嶺、開原之第一八二師、第八十八師、及第一九五師發生局部接觸，有切斷中長路的企圖。

(二)我軍以擊破四平街之敵，一舉收復長春、永吉之目的於五月十四日晨由兩翼包圍攻擊，將敵壓迫於遼河套內而消滅之。爾後分向東豐、海龍、長春、永吉、德惠、農安、三江口、鄭家屯追擊前進。攻擊

重點保持於右翼。

（三）右翼兵團（新六軍附第八十八師）於十三日在郜家店、蓮花街、大台子山一帶就攻擊準備位置，於十四日開始經西豐、赫爾蘇向四平街之敵左翼迂迴包圍攻擊前進，以一部協同第一九五師（該師由指揮所直接指揮），迅速楔入敵左翼陣地哈福屯、老爺嶺、三不管高地，主力指向赫爾蘇、公主嶺攻擊前進。協同中央兵團將敵包圍於遼河套內殲滅之，爾後繼續追擊前進，第一到達線公主嶺以南遼河套內；第二到達線梅河口、海龍、磐石、雙陽、長春；第三到達線小豐滿、永吉、其塔木及松花江東岸要點。

作戰地境線：開原、大台子山、哈福屯、公主嶺、長春、九台、其塔木之線，線上屬右翼兵團。

（四）中央兵團（新一軍）於十四日由現地發起攻擊，擊破當面之敵，即迅速追擊，與左右兩兵團協力將敵壓迫於遼河套內而殲滅之。第一到達線公主嶺以兩小城子；第二到達線長春以西雙城子之線；第三到達線德惠、農安及松花江北岸要點。

作戰地境線：舊四平、榆樹台、山城子、雙城子、農安之線，線上屬中央兵團。

（五）左翼兵團（第七十一軍欠第八十八師）於十四日由現地發起攻勢，協同中央兵團向雙山、昌北以北佔領陣地之敵右翼包圍攻擊，擊破當面之敵後，即轉向三江口、鄭家屯方向追擊前進，並確實佔領鄭家屯、雙山，肅清附近之敵。

令下後，十四日，在飛機炮火協同下，國軍各部隊分三路向四平街共軍大舉進攻。

父親奉命東北督戰

原先蔣中正曾下令東北行營限其四月二日前攻下四平街，可是國軍北上進展遲緩，前後拖延幾近二月，中間尚有挫敗，蔣為此十分焦急，而馬歇爾四月返華後又不斷向蔣施壓，促使東北停戰，更令蔣決心迅速解決四平之役，以謀長春。蔣接到杜聿明五月十四日之攻擊計劃後，擔心此役成敗，乃派父親於五月十七日赴東北巡視督戰㉙。時父親已發表為國民政府第一任國防部長，六月一日即將就職，名義上國防部長乃國軍軍事系統之最高決策人，蔣派遣他即將上任的國防部長往東北督戰，亦見其對四平之役的重視。每逢戰事緊急的關鍵時刻，蔣氏選派父親至前線解危，在北伐、抗戰時期，都不乏前例。「徐州會戰」，「台兒莊之役」戰爭最吃緊之際，蔣氏命父親赴前線協助李宗仁作戰，卒獲大捷，便是一例。

五月十七日，父親飛抵瀋陽。父親以首任國防部長由蔣中正主席特派至東北督戰，東北將士士氣為之一振㉚。自馬歇爾使華調停以來，東北國共戰事一直拉鋸於邊談邊打，且戰且和的混沌局面，此對當時採取攻勢的國軍至為不利，影響士氣甚大。父親對於國共問題一向堅決主戰，此次由蔣中正任命至東北督戰等於持有尚方寶劍，對於正在激戰中的國軍將士是一大鼓勵。東北將領自杜聿明以下多為所謂黃埔系的「天子門生」，別人可能難以駕馭，但父親卻與杜氏等將領頗有淵源。一九三九年父親主持「桂南會戰」，杜聿明時任第五軍軍長，率領麾下鄭洞國、廖耀湘等攻打崑崙關，戰爭至為激烈，反覆來往，雙方損失慘重，父親親臨前線指揮，授杜聿明以機宜，第五軍遂一舉攻下崑崙關，完成抗戰中著名的「攻堅」一役，杜聿明因此聲名大著。父親任軍訓部長期間，巡查第五軍，認定其訓練優良，曾特別下令褒獎。父親對杜聿明及第五軍幹部頗能賞識而且指揮得動的，這一次四平街會戰，父親往前線督戰，再度指揮杜聿明，二人合作，又一次創下輝煌戰果。

次日，五月十八日，父親偕杜聿明赴前線督戰，至開原指揮所，坐鎮指揮。此時前線戰爭異常激烈，已經到了決勝時刻，國軍分三路向四平進逼包抄。頃刻，鄭洞國來報，右翼兵團廖耀湘所率之新六軍已經突破共軍防線，由西豐、平岡，進出赫爾蘇，迂迴共軍側後，企圖切斷四平共軍退路，而左翼兵團陳明仁率七十一軍亦乘勢超越梨樹，夾擊側背，對共軍形成左右包抄形勢，至是共軍全線動搖，中央軍團第一軍軍長孫立人已於十六日由美返國親自指揮第一軍，在空軍掩護下，一舉突破共軍陣地，向四平挺進，林彪所部十萬餘共軍大敗，傷亡慘重。十八日晚，開始往北倉皇撤退。

五月十九日，國軍進入四平街，為時一月的第一次「四平街會戰」遂告一段落。四平既克，父親乃下令繼續進軍長春。在此關鍵時刻，南京統帥部獲得前方諜報，長春城內還潛留了六千蘇聯紅軍，因密令杜聿明，軍隊不准渡遼河，過公主嶺，杜聿明因對父親出示此一命令，父親乃說：「既是我下命令追擊，責任當由我負。」並同時當杜聿明面去電向南京當局報告，並連夜趕回南京向蔣中正說明實況。

父親此一當機立斷的決定至關重要。杜聿明雖有追擊共軍直取長春的決心，但中央當局的命令他不敢違反。父親是蔣中正特派到東北督戰的大員，本來就授有見機行事的權宜。父親當然也了解蔣的心意，攻打四平，意在長春。進攻長春有所顧忌是怕國軍力有不逮以及與蘇聯紅軍起衝突的危險。可是父親見到林彪軍隊已經潰敗，狼狽情形，出人意表，正應乘勝追擊，良機不可錯失，乃遽然獨斷下令，命杜聿明繼續追擊。杜聿明有了父親的命令，才敢放手部署，兵分三路以扇形追擊，繼續進軍長春，並在追擊途中，造成林彪部隊重大損失。

十九日晚父親回到南京即向蔣中正主席面陳，報告林彪部隊潰敗實況，力主繼續攻取長春。蔣當時尚頗猶豫，詰問父親：據報長春有六千着便衣之紅軍，萬一肇事起衝突，當之如何。父親以為林彪部隊已潰退，多六千紅軍，亦不濟事。蔣又問，如果紅軍再回來，又當如何。父親分析當前情況：按中蘇友好條約，蘇聯應照規定撤兵，既已撤兵，又再回頭，則中國政府不應負責任，而是聯合國的國際問題了。蔣聞言，當場未置可否。

蔣重視東北戰況，不甚放心，五月廿二日，父親趕返東北督戰時，蔣亦同行親往東北視察，同時還攜帶宋美齡及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委張嘉璈，共乘馬歇爾專機，飛往瀋陽。蔣在瀋陽落機的時刻，聞國軍已攻進長春，蔣大悅，先前疑慮一掃而空。杜聿明向他匯報了「四平街會戰」的實際戰況，蔣次日（二十四日）致行政院長宋子文函：「此間軍事情勢『共軍』之慘敗實為意想所不及也。」㉛ 林彪部隊潰敗之嚴重性，出蔣意料之外。又次日（二十五日）蔣致宋子文函：「自中到此以後，某國（指蘇聯）不斷作間接表示，決不對『共方』袒助，阻礙我統一，過去如此，今後亦必如此，惟望中國能早日和平，並探詢有否需要其盡力之處，此為其在我軍進入長春後所表示之姿態，余尚未作答覆，但據前後各方報告，最近某方態度確已與前大不相同。」㉜ 國軍進佔長春，蘇聯態度也改變了，竟不惜扯中共後腿，向蔣示好。蔣對蘇聯紅軍的顧慮既除，信心大增，在瀋陽親自指揮他的「天子門生」將領們，揮軍北上。隋煬帝及唐太宗都

曾領軍至東北親征高麗，蔣中正此次蒞東北督師也可說是「御駕親征」了，他手下的愛將們當然更加要賣命表現。國軍進佔長春後，隨即繼續分三路往北急速追擊向哈爾濱倉皇潰退的林彪敗部，左翼隊佔領遼源，右翼隊於二十四日佔領梅河口、海龍，二十六日佔領雙陽，二十七日佔領磐石、九台，二十八日佔領吉林省會永吉，中央兵團新一軍亦於二十九日佔領松花江的大門德惠及松花江北岸橋頭堡，三十日繼續佔領農安。

同日（五月三十日），蔣中正偕父親飛抵長春，這時東北前方戰事已至緊要關頭，新一軍沿中長路猛追，越過松花江，向哈爾濱逼近。在此歷史關鍵時刻，父親向蔣中正提出肅清東北共軍的全盤計劃：父親力主乘勝追擊，直取哈爾濱，乘 *&* 彪部隊潰不成軍失去戰鬥力之際，窮追猛打，一舉拿下齊齊哈爾、佳木斯及滿洲里北滿諸重要城市。進一步，父親主張組織民眾，編三百萬民團，保衛地方，肅清共黨勢力。父親並建議待東北情勢穩定後，抽調五個美械裝備師回關內至華北助北平行營剿共，打蟲榮臻部，等事畢再行調回。父親自告奮勇願意留在東北，繼續督戰，負責將肅清東北共軍計劃付諸實施。

可是蔣中正不同意父親留下，說道：

「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

父親力爭：

「委座在此，我也在此！」

蔣說出心中疑慮，父親停留東北，繼續戰共，怕馬歇爾責怪。

父親又力辯：

「馬歇爾責怪可以推到我身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蔣仍堅持要父親即日回返南京，就職國防部長。父親無奈，只得離開長春。

北伐父親任參謀長、抗戰任副總參謀長、國共內戰又任國防部長，中華民國三個重要戰爭階段，父親都出任蔣中正的軍事幕僚長，在北伐抗戰的緊要關頭，父親向蔣氏提過的一些重大軍事決策，也曾獲採納。

一九四六年五月卅日，父親在長春向蔣中正提出的這一套進軍哈爾濱，肅清東北共軍的計劃，可能是他做為幕僚長向蔣氏所做最重要的一個軍事建議，這個關繫國共東北戰爭甚至整體內戰成敗的建議卻偏偏未能被蔣氏接受。

同日，蔣中正亦離開長春飛抵北平。六月三日蔣返南京。四日，蔣中正接見馬歇爾特使，表示願接受馬歇爾建議，東北停戰。六日，蔣中正頒發第二次停戰令：

「余刻已對我東北各軍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擊前進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一機會，使其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政府採取此一措施，絕不影響其根據中蘇條約有恢復東北主權之權利。」

此時國軍孫立人率領新一軍已追抵雙城，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事實上四平兵敗，中共中央大為震動，毛澤東於六月三日已電令林彪，準備棄守哈爾濱。第二次停戰令下，新一軍追擊部隊乃停止前進，調回至陶賴昭及德惠縣一帶，採取守勢，以待和談解決。

六月二十一日，蔣中正應中共周恩來之請求，再度宣佈，將停止前進追擊的命令延長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為止。

共軍潰敗實況

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國共兩軍開戰之慘烈狀況以及林彪部隊被擊敗後往哈爾濱急速撤退遭國軍窮追猛打之狼狽情形，當時國共雙方都沒有宣揚。國民黨「剿共」打勝仗時，報紙照例會大登特登。但當時馬歇爾正在南京施壓要國軍東北停戰，因此有所顧忌，不便張揚。共軍吃了敗仗自然不願張聲，尤其當時周恩來正在設法談判停戰，以便東北共軍有喘息機會，所以對馬歇爾更要隱瞞四平戰敗真象。馬歇爾也竟然被瞞過，認為共軍主力並未被擊散㉝，對國軍以武力佔領東北毫無信心，所以亟力主張停戰。但蘇聯的情報卻較正確，國軍進佔長春後，斯大林態度大改，頻頻向蔣中正示好。

「四平街會戰」林彪部隊潰敗，整個東北共軍所受到之衝擊及其損失之嚴重性，要等到若干年後，中共公佈當年參加「四平保衛戰」一些將領、幹部的回憶錄及中共黨中央毛澤東與林彪等人互相來往的密電，才可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這樣記載㉞：

「四平保衛戰中我軍傷亡總數達八千以上，部隊元氣損失甚大，黃克誠之三師七旅，原為井岡山老部隊，四平撤退後只剩三千餘人，失去戰鬥力；萬毅之三師原有一萬三千人，經四平戰鬥傷亡及撤退被擊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戰鬥力；一師梁與初部，剩五千人，還保持有戰鬥力；二師羅華生部還保持有戰鬥力；鄧華保一旅損失相當嚴重，其次是三師、八旅、十旅、楊國夫部都弄得疲憊不堪和不少損失。」

這裏所謂「傷亡八千」，應該是個偏低的數目，韓先楚等人的回憶皆稱此八千傷亡戰士為「老骨幹」，意指從關內調來的老幹部、士卒。共軍到東北後也收編了不少偽軍以及當地的新兵，這些人的傷亡還不在此數，恐怕人數並不在「老骨幹」之下。其他損失如被俘、投降、逃亡的人數也不少，萬毅之三師原有一萬三千人，只剩四、五千，損失三分之二，相當可觀。黃克誠一向愛說真話，國軍佔領長春後第二天五月廿四日，他向中共中央發出一封痛定思痛的電報㉟：

「從三月下旬國民黨進攻起，到我們從長春撤退，我軍除南滿外，總傷亡一萬五千人。僅西滿四個旅及一部地方部隊，傷亡達七千左右，七、十旅連排幹部換了三次，部份營級幹部亦換了三次……幹部中一般

情緒不高，……這些現象是抗戰八年所未有。」

黃克誠列舉的傷亡數字是一萬五千，加了一倍。但南滿本溪之役還未算在內，防守本溪的共軍亦有十萬餘，戰況同樣激烈，尤其國軍空軍猛烈轟炸，杜聿明回憶一次飛機出擊即射殺共軍二千餘人，本溪之役，共軍「傷亡慘重」。

林彪亦承認「四平保衛戰」，共軍傷亡重大㊱：

「進入東北之敵，為國民黨最精銳的，新一軍又為其最強者，故我軍雖有奮勇作戰，傷亡重大，彈藥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份的消滅與擊潰敵人，而難於全部擊潰與消滅。」

國民黨估計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共軍傷亡的數字是四萬人㊲。如果把四平及本溪兩地共軍傷亡人數加起來，四萬人不算離譜。毛澤東原先下令林彪死守四平，本來就準備犧牲數萬人。林彪四平兵敗，果然損失數萬共軍，而四平並未守住，四平街並未化成馬德里。

四平街一仗對東北共軍衝擊不可謂不大，士氣受到嚴重打擊。誠如黃克誠所說，「是抗戰八年所未有者。」投降、被俘、逃亡的現象相當普遍。

共軍剛進東北收編了不少偽軍的游兵散勇，韓先楚說這些人「與國民黨軍進攻相呼應，紛紛嘩變，與我作對。」㊳ 羅榮桓談到四平撤退到哈爾濱沿途共軍叛變散逃的混亂情況這樣寫道㊴：

「從長春撤退到哈爾濱時思想很混亂，全軍無所措手足。無政府無紀律現象非常嚴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有些同志把新招編來的偽滿軍隊和新繳獲來的武器，看成自己的，不去充實和補充主力。這樣的部隊雖然有武器，但很不鞏固。敵人一進攻，散的散，叛變的叛變，給我們造成了很大困難。」

不僅新收編的士兵投降叛變，更嚴重的是一些闖關的老幹部思想也開始動搖，對鬥爭前途失去信心。林彪手下「東總」作戰科副科長王繼芳投降國軍，這件事影響頗大。王繼芳攜帶了林彪部隊撤退計劃等軍事機密，以致新一軍追擊林部頗為得心應手。鄭洞國手下指揮官劉德興上校從王繼芳處探知林彪部隊北滿後方空虛，乃向鄭洞國極力建議國軍應乘虛進攻哈爾濱及齊齊哈爾㊵。後王繼芳官至國軍少將參議，一九四九年在重慶被捕槍斃。

一九八九年中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張正隆的報告文學《雪白血紅》，張任瀋陽軍區某集團宣傳處中校幹事，在此書中，張遍訪當年參加東北國共戰爭的解放軍老幹部，紀實而成。其中寫到「四平保衛戰」及林彪戰敗撤退那幾章，對林彪部隊潰不成軍，投降逃離的狼狽狀況，有相當深入的報導及生動的描寫。他訪問的多為中下級幹部：他們對當年窘迫的情況侃侃而談，甚少顧忌。

十旅的指導員趙緒珍老人這樣描述：

「俘虜過來的跑，在東北擴大的跑，從關裡來的也跑，黨員也跑，幹部也跑，有的回家了，有的當土匪了，有的投敵了。走到東豐北邊，一天晚上跑十二個，帶走二十支槍，二十八顆手榴彈，二二零零多發子彈。連長王信圖，也帶支二十響跑了。」

王信圖是山東老八路，跑回了老家。二十三團二營副營長朱鐵武，十五歲參加新四軍，退到西豐，帶着管理員及通訊員投降國軍，四九年在上海被捕槍斃。

五師的指導員高秀成老人說「四平撤退那個亂勁，師找不到團，連找不到營」。從撫順撤退，營長高占會開了小差，還帶着管理員、通信班長、通信員一齊跑了。師裏領導懷疑高秀成，派個通信員監視他，誰不知通信員自己倒跑了。高秀成為此被關了三個月。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潮，持續了相當久。難怪羅榮恒指責當時「無政府無紀律的現象非常嚴重」。

國軍往北分三路追擊，因是機械化部隊，又有空軍掩護，行軍快速，一日三十英哩，三天已達一百英哩㊶，直追共軍。林彪部隊被俘虜有之，更多被擊潰四散。右翼新六軍進攻吉林，俘虜了東滿軍區司令周保中屬下炮兵團五百人，林彪五月廿九日給周保中、林楓等人電㊷：

「你們炮兵團的直屬隊，及一門榴炮彈，共五百人，其中大部份為革命韓國人，另外有十餘日本人，因未接你們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敵機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這些韓共曾跟隨周保中在東北抗日打游擊多年。

中央兵團新一軍從四平追到公主嶺，趕上林彪部隊、將之擊潰。六月一日彭真、羅榮桓及高岡給饒漱石等人並中央的電報㊸：

「我軍自四平撤至公主嶺附近時，敵以多路平行縱隊各附汽車坦克向我追擊，其受我抵抗之路則停止，而他路則進行包圍，飛機進行放肆轟炸，故被割斷我部隊甚多，至今尚存數團、數個營、數個連，落在後面，尚不知去向……」

這些四散的部隊吃了不少苦頭。三師獨立旅直屬隊和兩個團，從五月下旬流離於中長路及瀋吉路之間的三角地帶，至七月才歸隊。當時共產黨在東北還沒有建立群眾基礎，東北人民看見這些衣衫襤褸打敗了的「叫化軍」，拒絕援助。不少人開了小差，一團二連連長和指導員一塊兒跑了。後來歸隊的士兵，棉褲破得露出屁股來，見到舊日戰友，大家哭成一團。

自五月十八日四平棄守，林彪部隊開始撤退，至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戰令止，三個星期間，國軍一路窮追不捨，首尾相銜，直追過松花江逼近哈爾濱，共軍在這沿中長路數百哩的路途中倉皇敗退，或降、或逃、或被俘，其驚險狼狽，黃克誠、羅榮桓這些將領都認為八年抗日未曾經歷過，羅榮桓非常生動的描寫了當時撤退的窘態㊹：

「打了這麼多年的仗，還從來沒有這樣被動過。我們一勁兒地撤，敵人一直在屁股後面追，就像拖了個尾巴。」

「四平保衛戰」應該是林彪生平頭一大敗仗。林彪部隊死守四平，戰況慘烈，八萬人口的四平街幾乎夷為平地。四平失守，關鍵在於國軍右翼新六軍於五月十八日突破了共軍三縱的防線，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以六百輛汽車快速將軍隊強行通過，最後佔領了四平的制高點塔子山，塔子山失守，便有封閉四平守軍退路的危險。至此，林彪看見大勢已去，乃召集部下，預備全軍撤退。他對陳沂（「前線」政治部副主任）等人嘆道㊺：

「和平空氣，在我們今天的東北是最害人的。我們對全部美械裝備的敵人還是估計不足，三縱的防線被新六軍突破，影響保衛戰全局，這是最大的教訓。」

「四平街保衛戰」是毛澤東要打的，目的在為和談停戰前取得更大籌碼，所謂「最後一戰」，所以林彪部隊才傾巢而出孤注一擲，林彪現在認為這種想法「最害人」了，這是敗軍之將的自我檢討。林彪於五月十八日向中央東北局發出了「巧亥」電㊻：

「敵本日以飛機大炮坦克來掩護步兵猛攻，城東北重要陣地失守，無法挽回，守城部隊處於被敵切斷的威脅下，現正進行退出戰鬥。」

十九日，中共中央毛澤東回電時，林彪部隊早已於十八日晚撤出四平㊼：

「巧電悉。(一)四平我軍堅守一個月，抗擊敵軍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強英勇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二）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地放棄四平，以一部在正面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變為運動戰。……」

毛澤東這封電報的口氣低沉蕭索，「把四平變成馬德里」的豪興完全沒有了。中共中央顯然已認識到四平失守的嚴重性，一連發電給關內各軍區，飭令各區不得有所行動，以免國軍有藉口在關內開大戰。

四平失守，對林彪的聲譽及心理的打擊是大的，甚至一些當年非常熟悉崇敬林彪的老部下，也開始懷疑：「林總」是不是多少年沒打仗了，不會打仗了？士兵暗暗咒罵：「撤退將軍」、「逃跑將軍」㊽ 。長春棄守後，情況更加混亂，林彪所受壓力太大，在路上情緒失控，脾氣變得一反常態。退到舒蘭的時候，他的部下參謀處的李作鵬、向敬之等人停下來喝酒，林彪上去把桌面一掀，抓起炕上行李便向李等人摔去㊾。

情況愈來愈緊迫，林彪及東北局不得不向中共黨中央毛澤東報告四平兵敗後，東北實況，並請示日後方針。五月二十六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說㊿：

「東北我軍經過長期苦戰，主力甚為疲憊。敵已佔領四平至長春線及鄭家屯、西安至海龍線。我西滿、北滿甚為空虛。同時東、西、北滿土匪尚未肅清，今又乘虛彌起，現敵向我軍前進，我甚難作有力抵抗。今後作戰方針，請中央指示。」

這封電報承認東北共軍已十分虛弱，失去戰鬥能力，無法抵擋國軍的進攻了。當新一軍越過松花江向哈爾濱進逼的時候，黃克誠與林彪同時向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告急。

五月卅一日黃克誠電㉛：

「毛主席：

東北情況很混亂，很難阻止敵人佔齊哈，假使退出齊哈，能取得和平停戰，則堅決退出求得停戰，來整理內部，以求再起，時機緊急，請考慮。」

六月一日，林彪電中央周恩來等㊿：

「準備游擊放棄哈齊。」

毛澤東考慮了兩天，終於在六月三日覆電林、黃，同意放棄哈爾濱㊼：

「同意你們作放棄哈爾濱之準備，採取運動戰與游擊戰方針，實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對東北工作指示，作長期打算，為在中小城市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而鬥爭。對於分散與孤立之敵據點。應在可能條件下取之。目前軍隊應爭取休整，恢復疲勞，提高士氣。」

此時，六月一日，國軍新一軍迅速追過松花江北岸，抵達雙城，哈爾濱遙遙在望。哈爾濱城內東北局已將物件裝車，準備隨時棄城出走了。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突然間，峰迴路轉：晴天霹靂，新一軍接到蔣中正停戰命令，六月七日起，國軍停止追擊。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大為震驚。趕緊向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力爭：國軍應乘勝追擊，過松花江直取哈爾濱，將日本人所築長期防俄入侵的連線永久工事佔領，逼使共軍永遠龜縮佳木斯一帶酷寒地域㊾。但當局命令終不能違，新一軍只得回轉陶賴昭待命。此後，國軍再也沒有機會越過松花江。

從當年的林彪到今天那些參加過「四平保衛戰」的共軍老幹部都説，國民黨沒過松花江向北進攻是失算。否則，共產黨的日子將更難過㊿。

蔣中正本人如何看待「四平街會戰」呢？他在〈蘇俄在中國〉中如此評述這一仗㊿：

「激戰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號稱三十萬大軍，被我國軍總指揮杜聿明部徹底擊敗，傷亡過半，其他殘部潰不成軍，分途向中東鐵路、哈爾濱綏芬河一帶崩潰。杜總指揮即於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進佔長春，並令其所部以哈爾濱為目標，沿長春鐵路線向北追擊，勢如破竹，匪軍毫無抵抗行動。此一剿共戰役，可說是繼二十三年在贛南五次圍剿以後，又是最大一次決定性的勝利。而其共匪當時潰敗的情況，及其狼狽的程度，實與其在贛南突圍逃竄時的慘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三四年，蔣中正親自在江西督戰，對共軍實行第五次「圍剿」，促使毛澤東等率部逃往陝北，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是國民黨剿共史上最大的一次勝利。但蔣氏在此處認為「四平街會戰」共軍潰敗之慘狀，比第五次「圍剿」猶有過之。這對「四平街會戰」一役，是很高的評價。證諸中共日後發表有關此役的文獻看來，蔣氏這段評語，似乎並未誇大。這是十年後，蔣氏的回憶，對四平一役的狀況及意義，應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四平失守，對東北共軍林彪部隊以及中共黨中央的震動可以說是空前的。共軍戰後闖關，在東北佔了種種機先，又在蘇聯紅軍庇護下，攻城掠地，東、西、北滿的重要城市以及中長路兩側戰略地區全部囊括。可是四平兵敗，林彪部隊半年多來在東北慘淡經營的優勢，一夕間，化為烏有，連北滿最後一個大城哈爾濱也險些不守。林彪部隊在四平一役，敗得很徹底。分析其敗因，有下列這幾項：

(一)戰略錯誤，共軍一向以游擊戰、運動戰著稱。無論抗戰前對付國軍以及抗戰時與日軍周旋皆以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略致勝，這也是毛澤東最引以為傲的。但「四平街會戰」，林彪部隊打的卻是集中主力的陣地戰，這種正規戰，並非共軍所長，士兵亦缺乏經驗。四平街戰線長，防禦縱深淺近。遇到強勢的國軍，林彪部隊便吃了大虧。

(二)國軍美式機械裝備，戰鬥力遠勝過共軍。飛機、坦克車、重炮這些武器皆其軍所無。四平、本溪之役，國軍陸空聯合作戰奏效。國軍完全掌握制空權。殺傷力大。共軍死守四平雖然頑強英勇，但終不敵國軍強大火力的攻擊，傷亡頗眾。有些共軍老幹部回憶，那樣猛烈的火力，連抗日時都沒有遭遇到過。進攻四平的國軍新六軍、新一軍、第七十一軍皆為國軍之佼佼者，將士素質高，戰鬥經驗豐富，而且初到東北士氣高昂，戰鬥力強。

(三)共軍在東北還來不及建立根據地，沒有群眾基礎，東北人民當時仍心向國民黨中央政府，對共軍持有敵意。四平兵敗，林彪部隊連傷兵也找不到人抬。撤退時，糧食供給困難，人民不予支持援助。共軍初到東北，相當孤立，也就是黃克誠所謂的「七無」。

(四)關於死守四平，東北共軍及東北局內部思想並不統一，因此而產生矛盾。像黃克誠、羅榮桓等人基本上是不贊成的，認為還是應該採取「且戰且退」的戰略，放棄中長路沿線的大城市，以農村及小城市

為立足點來包圍大城市。後來毛澤東親口告訴黃克誠，死守四平，是他本人的意思。但四平兵敗，中共中央卻拿彭真來頂罪，把他東北局書記的職位撤掉。「文化大革命」時，彭真被鬥，死守四平，導致共軍慘重損失，也是他主要罪狀之一。

「把四平變為馬德里」是毛澤東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毛澤東不僅輸掉了四平，很可能連整個東北都險些給輸掉了。但蔣中正頒第二次停戰令卻讓了毛澤東一 *&* 終於把東北這局險棋扭轉乾坤，反敗為勝。

一項改變歷史的軍事錯誤 —— 第二次停戰令

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後，痛定思痛，開始檢討大陸失敗的原因。軍事方面，國民黨高級將領紛紛提出在大陸與共軍作戰所犯的錯誤[57]。蔣中正總統本人也終於對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爭的影響，在他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做出了這樣的結論[58]：

「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擊，直佔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蔣中正在這裏把最後國軍在東北失敗，四十七萬精銳盡喪敵手，完全歸咎於他自己頒發的那道第二次停戰令，這是很嚴重的說法。蔣氏這段檢討相當坦率而沉痛，這在蔣氏言論中，並不多見。如此重大而牽動全局的一項決定，蔣氏當時到底是在何種客觀狀況及主觀心態下而做成的呢？這個問題值得仔細研究推敲。

首先是蔣中正究竟是在何時下決心命令國軍先鋒部隊停止追擊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三日，蔣中正偕父親等人飛蒞瀋陽，當天國軍正進佔長春，蔣氏到東北，親眼看到國軍士氣如虹，並得知林彪部隊潰不成軍，而且蘇聯態度又有改變，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時對國軍是否應該進軍長春，繼續往北推進有所疑慮，此刻他已沒有顧忌了。五月廿五日，他在日記中，如此記載[59]：

「東北『共軍』主力既經擊潰，應速定收復東北全境之方針，令杜聿明長官部向哈爾濱兼程挺進，必先佔領該戰略據點，東北軍方得告一段落，然後再策定第二期計劃。」

可見這時蔣對哈爾濱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認識十分清楚，而且有決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隊往哈爾濱挺進佔領。一直到五月卅日蔣離開長春飛往北平，其間即使他心中已經開始考慮何時下停戰令的問題，顯然他並未告訴父親或杜聿明等人，否則父親及杜聿明在瀋陽或長春一定會向蔣力爭繼續北進佔領哈爾濱了。事實上五月卅日這一天，蔣還接到行政院長宋子文的「??電」：

「文今晨播　鈞座函譯文及三妹函交馬使，談二小時，馬謂鈞座意甚懇切，可希望作為解決之根據，渠

即將招周恩來談，告以渠之意見。（一）交通即設法恢復；[60]（二）美方對於若干事件保有決定之權，（三）『共軍』應退出哈爾濱、齊齊哈爾。以上三點，應由『共方』接受，除此外，無法調停……」

可見馬歇爾也同意蔣的看法：共軍應退出哈爾濱及齊齊哈爾。按理說蔣中正下令國軍進佔哈爾濱、齊齊哈爾，更加有理可據了。雖然馬歇爾的意思是要由他與周恩來談判來達成共軍撤出哈、齊，但至少他也承認了共軍佔領哈、齊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飛返南京的前一天，六月二日，蔣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戰　。雖然停戰令六月六日才正式宣佈，但六月二日顯然已經通知東北行營。蔣氏在這短短兩三天內獨排眾議，不採納東北杜聿明諸將領以及父親的建議，進攻哈爾濱，而做出此一重大決定。尤可異者，蔣氏不待返南京後，與他最親信的參謀總[61]長陳誠等人先開會商議，遠在北平便獨斷決定下令停戰，而且返南京後第二天六月四日，馬上逕自向馬歇爾宣佈六月六日，主動停戰十五天。到底是何種原因促使蔣中正倉卒間做出如此影響大局的停戰決定？

多年來，國民黨官方的說法，以及蔣中正本人記載的言論中顯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蔣中正宣佈這道第二次停戰令，是由於馬歇爾特使的壓力。有的美國學者也傾向這種看法　。馬歇爾對蔣中正所施的壓力的確很大，三番四次威脅要退出調停切斷美援。為了安撫馬歇爾而下令停戰，這是原因之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馬歇爾返美述職，至四月十八日才重回中國。這[62]期間，因蘇聯紅軍開始撤退，共軍乘機進佔中長線上瀋陽以北的諸大城市，東北國共兩軍的衝突乃日趨尖銳，馬歇爾抵達重慶當天，四月十八日，共軍打入長春。馬歇爾看見東北戰事擴大，大為震驚。因此，他返華第一要務便是要調停東北戰爭，將他慘淡經營而成的一月十日第一次停戰令，擴展到東北。但當時共軍處處佔上風，接着又進佔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大城，周恩來在談判桌上姿態甚高，馬歇爾雖然明知共軍進佔長春，乃違反停戰協定，但馬與周交涉共方撤軍，迄無結果。他唯一能使勁的地方，便是向蔣中正施壓，要國軍讓步。四月二十三日，蔣氏與馬歇爾會談後，日記中記載：「馬歇爾氏於談話中，全用壓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對東北問題再作讓步。」　馬歇爾咄咄逼人之勢，蔣氏深有所感，但當時「四平街會戰」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蔣早已佈署停當，與共軍一決勝負，當然不可能一時屈服於馬歇爾的要求。馬甚感不耐，翌日與蔣再會面，對中央政府黨政軍的種種不是，竟肆意攻擊起來，「聲色俱厲」。蔣為了顧全大局，也只得「寬予容忍，不與計[63]較」。當初馬歇爾使華，主要任務之一即是處理東北危機，而今東北蘇聯紅軍撤出後，情況反而惡化，國

共軍隊大打出手，馬歇爾個人聲譽固然大受打擊，而東北戰爭，可能引發國共全面內戰，更教馬歇爾心急如焚。他不顧一切，頻頻向蔣中正施壓，以致言辭失禮，正也顯示他夾在國共之間，調停一籌莫展，內心挫敗之深。

蔣中正於五月二十三日飛往瀋陽，他離開南京前告訴馬歇爾：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東北軍事長官之報告，國軍或已向長春挺進，他親自前往瀋陽，以控該地局勢。這當然是托辭，父親十九日返南京已向蔣氏報告東北戰況詳情了。蔣於五月二十五日給宋子文函中　，承認他之所以來瀋陽，就是要避開馬歇爾的糾纏。但馬歇爾並沒有放鬆，一直電蔣催逼他下令國軍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停止前進攻擊」。此時中共四平兵敗，乃發動宣傳猛烈攻擊馬歇爾包庇國民黨，擴大東北戰事，中共目的當然在促使馬歇爾逼蔣停戰。馬歇爾這時是啞子吃黃連，有口難辯，尤其蔣飛瀋陽，乘⑥④是馬歇爾座機，於是中共更有藉口攻擊蔣赴東北督戰係出於馬歇爾的指使。馬歇爾大為窘迫，逼得馬上無線電廣播，公開呼籲蔣中正下令停戰，以便撇清中共對他的指控。五月三十一日，蔣中正已到達北平，馬歇爾還追電過去　：

「鄙人茲特重向鈞座聲述，政府在東北軍隊之繼續前進，不但使本人之調處急趨困難，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大為動搖，因之鄙人特思再懇請鈞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軍隊之前進攻擊與追擊……。」



馬歇爾此刻已顯得氣急敗壞，語近威脅，有意退出調停了。六月四日，當蔣中正返南京會見馬歇爾，告之決定六月六日頒佈停戰令時，馬歇爾欣喜之情，可以想見，很可能他會認為，他向蔣中正不斷施壓，終於奏效。

蔣中正真是完全屈服於馬歇爾壓力而頒發第二次停戰令的嗎？恐怕並不盡然。

首先，馬歇爾來華調停之初，汲汲於催促蔣中正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又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達成第一次停戰協定，在蔣看來，馬歇爾所作所為皆有利於中共，對國民黨政府則為害甚烈。因此，一開始，蔣中正對馬歇爾來華調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的。他在日記中　，對馬歇爾的批評，坦率、中肯，對馬歇爾調停所產生的害處認識也很清楚。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對馬歇爾便這樣批評：

「彼對我國內情形及『中共』陰謀並無了解，終將誤大事也。」



他審閱了馬所提「臨時政府組織法」，感慨道：

「此為『共黨』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對他國政治之隔閡。若本自無定見，不僅誤事，且足以召亡國之禍也。」

蔣甚且認為聽從馬歇爾，會召來「亡國之禍」，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見」，這是很重的話。第二天開「政協會議」，蔣看見馬歇爾被中共周恩來、民盟羅隆基等人包圍，對中國國情又「隔閡異甚」，蔣擔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史迪威是馬歇爾的老部下，甚得馬器重，史迪威事件後，馬歇爾對蔣中正難免不生成見。他到中國後，蔣看見他言行之間，竟處處偏向中共，與史迪威當年同出一轍，難怪蔣「憂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損害中美關係。在蔣看來，馬歇爾專以妥協中共為能事，簡直「完全為『共黨』宣傳所迷惑矣」。蔣的說法、也不無道理，三月初，馬歇爾竟親自跑到延安去巡視，受到中共盛大歡迎，毛澤東乘機向馬歇爾建言：「解決國共軍事衝突之關鍵，端在美國立即停止對華軍事援助。」　後來馬歇爾果然切斷對國軍軍援八個月之久。

馬歇爾返美國述職回重慶，當時東北國共兩軍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馬歇爾仍主張對中共採取妥協法。蔣中正認為馬「只求暫時不發生戰爭，即視為調停成功[67]，而於我國之實際利害成敗，則毫未計及。」，乃直告以「非先改變其對『共黨』之態度與方針，決不能達成調解之目的。」馬歇爾毫不為所動，兩天後四月二十一日，竟呈送蔣備忘錄一份，擬以美軍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馬認為這樣，美國軍官得以訓練中共部隊，以利國共兩軍之整編。幸虧馬歇爾這個打算魏德邁早已悄悄告訴蔣中正了，否則馬歇爾這個建議的震驚效應恐怕更加鉅大。四月二十八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他對馬歇爾的觀察：

「近察馬歇爾氏之心理及其態度，乃極以對『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頓為慮，時現恐懼與無法應付之情[65]態，其精神幾已完全為共黨所控制，一惟『共黨』之要求是從，無敢或違，凡與『共黨』心理牴觸之條件，皆不敢向『共』方試談，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這裏，蔣氏認為馬歇爾已經着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牽着鼻子走，已失去調停的能力了。而且馬歇爾對國軍毫無信心，認為國軍在東北絕無摧毀共軍的能力。「四平街會戰」，國軍打了大勝仗，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已往北邊撤退，可是馬歇爾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對國軍進佔長春。蔣中正這次真的光了火，五月二十四日，在瀋陽日記中把馬歇爾狠狠的批了一頓：

「馬歇爾不問我國之利害禍福如何，亦不顧其國政策之能否實現，而惟以其個人之功利成敗是圖，一意對『共黨』遷就，以致揚湯止沸，勞而無功。近聞馬歇爾向子文表示，對我軍進佔長春，甚不贊同，此乃其一貫之錯誤政策，無足為異，此時惟有竭盡吾人之心力，以至誠感之，以促其覺悟耳！」

四平兵敗，中共中央震動，為了挽救頹勢，周恩來馬上換了一副姿態，向馬歇爾表示希望停戰和談了。五月二十七日，蔣中正看到馬歇爾轉來周恩來致馬的備忘錄，前倨後恭，嗤之以鼻，記道：

「周恩來之奸謀狡計，自在意中，而馬歇爾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祇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戰，俾其個人任務，得以迅速達成，而不顧我國脈民命之存亡絕續，為可慨也！」

由此可見蔣對馬歇爾充做國共內戰調停人之短處及局限，有相當清楚的認識：馬歇爾昧於中國國情、迷惑於中共的宣傳、對中共一味妥協遷就、只管個人調停得失、置國民黨政府存亡於不顧，而且對東北戰況根本不清楚。蔣氏並曾自我警惕，聽從馬歇爾的調停，可能招致亡國之禍。蔣氏既有此等認識，更了解中共戰敗求和是「奸謀狡計」，而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短短數日，竟會完全屈服於馬歇爾的壓力，而做出影響東北全局的停戰決定，似乎於理不合。試觀其後蔣與馬的關係，第二次停戰令終止以後，關內國共兩軍，反而大打起來，全面內戰開始。蔣不顧馬歇爾退出調停的威脅，於當年十月毅然下令進軍內蒙重鎮張家口，因此觸怒馬歇爾，切斷對國軍美援八個月。由此可見，蔣氏指揮國軍進退，自有主見，不一定那麼容易受馬歇爾左右。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蔣中正倉促間頒發第二次停戰令。應該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中，特別闢一章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其中有一節是：「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蔣氏承認由於「自信太過」，「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他舉例一九二七年清黨及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圍剿成功，對共黨「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追剿，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在先前檢討「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時，蔣氏自己說明他下第二次停戰令的理由　：

「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鉅深之餘，苟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定等諾言，仍可予其悔過自新，效

忠國家另[68]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接着蔣氏沉痛檢討 ：

「這不僅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69]，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蔣中正於五月廿三日飛瀋陽後，得到前方報告，發覺共軍大敗，嚴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瀋陽那幾天親自指揮國軍追擊，連連得手，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往北竄逃。五月廿四日，他函馬歇爾，由宋美齡執筆，提出對中共停戰和談條件，比先前嚴苛甚多，而且口氣強硬，幾乎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敗方招降了。因此，蔣中正於六月二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戰很可能是基於下面的原因與動機：

蔣中正確實認為共軍「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決無再起可能。」他六月二日返南京前下令國軍停止追擊，一方面可以安撫馬歇爾，緩和美方國力，同時還留了一着活棋。六月七日，在停戰令生效的同一天，他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 ，內附??馬歇爾信：「即在東北，國軍有行動自由，及政府在東北接收政權，不受阻礙。若共軍再有攻擊。即予反攻。再共軍恐難就範。故仍須準備進攻。」蔣氏顯然並不相信共軍會遵守停戰協定，但同時他卻認為，下令停戰後，國軍仍舊有能力，隨時可以再進攻。

事後看來，一九四六年六月初 [70]東北林彪部隊「東北民主聯軍」，「四平街會戰」兵敗，損失慘重，已失去戰鬥能力，可以說是其整個東北戰爭中，最虛弱的一刻，而國軍四平大勝，新一軍在陸空聯合作戰的威力下，勢如破竹，直追過松花江岸，離哈爾濱不足一百里，也是國軍上氣最高昂的時分。當時的國際形勢，對國軍亦最有利，蘇聯斯大林玩兩面外交，看見共軍在四平會戰中節節敗退，已認為東北戰爭，國軍一定會贏，乃於五月六日，透過蔣經國邀請蔣中正訪俄。國軍進佔長春後，蘇聯態度轉變更大，向國民政府示好，表明不會支援共軍了。至於美國方面，亦承認共軍進佔長春、哈爾濱，是破壞馬歇爾促成的停戰條約，因此國軍師出有名。而且此時關內國共戰爭還沒有全面展開，國軍在東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國共兩軍在東北一決勝負，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是國軍佔盡力優勢的關鍵時刻，這個良機一失，國軍便再無贏得東北的可能。

蔣中正當時對東北局勢顯然作了錯誤的判斷，他沒有考慮到驟然下令停戰，對國軍帶來的嚴重後果。正如他檢討中自云，由於「自信太過」，對共軍產生了輕敵心理，以為林彪部隊，「決無再起可能」，乃貿然下令停戰。第二次停戰令下達的時機，完全違反軍事原則，曹劌論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兩軍對壘，往往是一場比較士氣高下、意志力強弱的決戰。正當國軍一鼓作氣，往北挺進，眼看勝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對當時將士心理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從此東北國軍上氣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從這道第二次停戰令開始。整個內戰，國軍首先敗在士氣不振，而非在軍備人數，而第二次停戰令對國軍士氣之打擊，就是一個最顯着的例子。對當時正在倉皇潰退中已經搖搖欲墜的林彪部隊，第二次停戰，從六月七日至三十日，長達二十三天，不啻天賜良機，得到一個重新集結轉敗為勝的喘息時間。這無異是縱虎歸山、養虎貽患，打蛇而不打七寸，其反撲厲害可知。尤其令人費解者，林彪部隊已經準備撤守哈爾濱，國軍應有情報，即使要停戰談判，也應等新一軍將這座北滿戰略重鎮拿下，談判桌上籌碼才會更多。哈爾濱唾手可得而不取，讓共軍佔去，日後哈爾濱遂成為林彪部隊休養生息，最大的反攻根據地。這個八十萬人口東北北方工業經濟中心，對共軍政治、戰略、經濟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國軍當時將哈爾濱拱手讓敵，是包藏禍心，遺害無窮。

事後國軍將領，尤其是參加過東北戰爭的，都一致認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頒發停戰令，是東北戰爭成敗一個關鍵性的錯誤決策。當年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驤的看法，可為代表：

「當我軍佔領吉林、長春，匪勢衰頹的時候，就應該不顧一切，擴張戰果，向哈爾濱追擊。如能佔領哈爾濱、佳木斯等要點，而控制中俄邊境，則匪軍主力不能聚集存在，更不能在松花江北岸休養生息。俄帝蹤把日本關東軍的裝備，補充匪軍，擴編匪軍，事實上亦甚困難。當時匪軍在東北尚無政治基礎，其一套虛偽宣傳與政治欺騙，也非短時間所能奏效。假使我們在軍事上佔領要點要線，政治上先匪一着，積極建設，清明廉能，與民更始，則東北的接收，必可勝利完成，且可永久穩固，邁進民主之坦途。詎知我軍正當由吉、長北進之際，因為馬歇爾的調停而停戰，我們逸失好機，爾後永遠未見再來。所謂好景不常，功虧一簣，遂註定失敗命運。」

此處趙家驤當然不便點明是蔣中正所犯的錯誤，外國學者論到這一段歷史，也有持相同論調者，不過對蔣中正的批評，就沒有這樣含蓄了。美國歷史學家唐諾・吉林(Donald G. Gillin)，他在《蔣介石與馬歇爾：

一九四六年四平街之災禍》(Chian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ch 1946)中，如此結論：

「多年後，蔣在他回憶錄（按，《蘇俄在中國》）中宣稱東北停戰是他所犯最大的錯誤。誠然，事後觀之，這是軍事上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之一。但這是一個更大的政治錯誤的結果。那就是，蔣氏堅持要維繫與美國結盟而不惜付出一切代價。」

公元三八三年，前秦苻堅率百萬大軍南下，晉廷大震，宰相謝安派大將謝石、先鋒謝玄率軍迎敵，兩軍對峙於淝水（今安徽境內），但晉軍只得五萬，不成比例。謝石請求苻堅將軍隊稍往後撤，以便晉軍渡河開戰。苻堅本為雄才大略的領袖，此時卻因驕兵輕敵，誇言投鞭足以斷流：竟答應晉軍這項荒謬的請求，下令撤軍。孰知一聲令下，秦兵陣腳大亂，退勢遂不可擋，晉兵乘機進攻，大敗苻堅百萬雄師。前秦帝國由是土崩瓦解，中國南北朝分裂局面，因此而延續了兩百多年。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領袖一個錯誤的軍事決策，一個輕率的軍事命令，足可影響一國之興亡，改變歷史的發展。

毛澤東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最嚴重的軍事錯誤，差點輸掉整個東北，但蔣中正下令國軍停止追擊，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把東北失去了。很可能，國共內戰的勝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經決定。

「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父親在台灣上書蔣中正總統一封密函，其中有這樣一段　：

「抗戰勝利後林彪竄擾東北得蘇俄接濟佔據東北戰略要點四平街國軍久攻不下職奉鈞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師三日而攻克之當時我統帥部曾獲諜報蘇軍約六千潛留長春故密令國軍不准渡遼河職當時身臨前敵關於匪情比較清楚故本上級指揮官企圖曾獨斷下令嚴飭杜總司令聿[72]明率部越過遼河追擊攻佔長春吉林匪所部死傷慘重潰不成軍確已失去戰鬥能力若照職原定計劃繼續窮追本可將其消滅於東北境內以免該匪後來在東北接受蘇軍繳獲日本關東軍五十萬人之優良裝備為我第一勁敵同時我可將東北國軍精銳調進關內形成重點使用剿匪軍事或可改觀無奈馬歇爾將軍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強迫東北國軍停止追擊遂使林匪坐大反噬養虎遺患往事追維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

同年十二月，蔣中正的《蘇俄在中國》在台灣出版，這時距「四平街會戰」已有十年。蔣中正與父親，兩位「四平街會戰」的主事者，在十年後，各自追憶起這一段國共鬥爭的歷史關鍵，同感「痛心疾首」。蔣氏悔恨當初錯下第二次停戰令，父親則痛惜蔣中正未能及時採納他的建議，徹底消滅東北共軍，以致林彪部隊坐大反噬。

父親一向冷靜沉着，喜怒輕易不形於色，但不止一次，我親眼看到他晚年在台灣，每提起這一段往事時，猶自扼腕頓足，憾恨之情，溢於言表。我很少看見父親論事如此激動，即使論到「徐蚌會戰」另一個與他糾葛甚深的戰役，他也沒有像對「四平街會戰」，感到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會戰」，最後竟功虧一簣。一着棋錯，滿盤皆輸，這是父親一直耿耿於懷，到他晚年亦常引以為憾的一件恨事。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替父親做口述歷史訪問，從一九六三年起，共訪問了一百二十八次，共五十二萬言，可惜還未及談到國共內戰。一九六六年，父親遽然逝世。因此，來不及論到一九四六年的「四平街會戰」，但即使如此，父親的「訪問紀錄」中，竟有四處提到這一個他始終未能釋懷的戰役：

（一）第四十七次訪問，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訪問者：陳三井，頁四五七——九。

「先是共匪林彪為匪偽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統率匪軍十萬之眾，於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蘇聯紅軍撤出東北時，由紅軍之手接收得關東軍軍械五十萬枝，乘國軍未開到之前，襲佔四平街，終與國軍相持不下。當時我奉命至四平街督戰，並迅速將林部擊潰，繼佔長春、吉林，本可就此乘勝追至佳木斯或滿洲里，將林部殲滅或驅出東北境外，以永斷禍根。而中央忽令軍事歸杜聿明指揮，且軍隊不准越過遼河，理由為長春

有六千便衣紅軍，若我軍越過遼河，恐引起衝突。當我一到四平，下令繼續追擊時，杜聿明即出示此一命令予我，我說：『即是我下命令追擊，責任當由我負。』當時我一面去電向當局報告，同時乘飛機返京向蔣先生面陳云『戰勝則當進，或追出國境，或予以殲滅，蓋匪已倉皇撤退，全無鬥志矣！』蔣先生道：『據報長春有六千着便衣紅軍，萬一肇事起衝突，怎樣？』我說：『匪已潰退，多六千紅軍亦不濟事。』蔣問：『若紅軍再來，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人之責任，按撤兵規定，紅軍應已撤回，若紅軍再來，此乃聯合國之問題。』委座聽罷，當場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機將行，蔣先生因重視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馬歇爾專機直飛瀋陽轉長春（當時軍隊已到長春），委座一見前方軍事進展順利，極為愉快。當時我即建議繼續追擊，亦表示說，若東北剿赤完畢，可以少數部隊佈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裝備師於華北助北平行營剿匪，待事畢再調回。蔣先生說：『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杜聿明去做。』我說：『委座在此，我也在此！』他當即說：『你在此，若馬歇爾問你是否要繼續追擊，你不好說話；你回去，我在這裏，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還是回去。』此來，我只得返京就任國防部長。

其後，馬歇爾八上廬山，壓迫政府下停戰命令。杜聿明於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予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逐漸予我不利。當時若長驅北進，直下東北，消滅林彪之大患，而後抽兵入關內，如此於戡亂大局或稍可改觀。」

（二）第一百零五次訪問，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一五——六。

三、民國三十五年健公到東北督戰，此事請健公詳述。

答：共軍得了關東軍槍械，守長春、四平街，杜聿明攻打未下，蔣主席着急了要我去東北。我到了以後，部署一下，打了三天，把四平街打下了（按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收復四平街）。這時中央得了一個情報說有六千俄國紅軍便衣隊在長春支持林彪，下命令給杜聿明：打下四平街後，不准過遼河，不准過公主嶺。我看林彪部隊在四平街打敗，在白天撤退的，臨退把十六個列車炸毀了，如此狼狽，喊杜聿明追擊，杜說：「中央有命令不能過遼河」。我說：「甚麼原因？」他說：「長春有六千紅軍便衣，紅軍在哈爾濱朝發夕至。」我說：「我有計劃，我負責任。」我當他面向上面一個報告，上面下命令：「繼續追擊。」我

連夜趕回向蔣主席報告：「要取長春。」他很沉重的樣子，我說：「打了，少六千敵人，他再進兵來是聯合國的事。」他「唔！唔！」連聲。第二天，我要飛東北，他說：「我們一起走。」我們一起到瀋陽吃午飯（此日為五月二十三日），飛機一下來，知道我們戰車已到長春，蔣主席高興極了，說：「吃了飯，我們到長春。」

我主張取了長春攻哈爾濱，直取佳木斯，主張編三百萬民團自動保護地方，我希望在東北負一些責任，而蔣主席硬要我向南京就國防部長職。」

（三）第一一四次訪問，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六五。

「九、健公常講大陸丟了，健公等負方面重責者有責任，當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是方面大員，但有人認為大陸之敗，非戰之罪，軍事失敗不過原因之一，此外像經濟、政治、教育等的因素也很重要，甚至因此而影響了軍事之敗，互為因果，健公對這種說法認為如何？

答：我不以為然，最重要的還是軍事，軍事逆轉，經濟亦逆轉，大陸才崩潰下來。三十五年，關外有五個美械軍，四平街一仗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長春，如果我們一直打，打到哈爾濱、滿洲里、佳木斯，把他們打完了，把東北民眾組織起來，把頭一等的軍隊調回關內打聶榮臻，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戰爭，戰事好轉，其他一切也不致於崩壞下去，可能就獲得了勝利。

（四）第一一八次訪問，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訪問者：陳存恭，頁八七三四。

「美國素來主張國共和平共處，馬歇爾等很天真，中了俄共中共之計，認為中共不是共產黨，是土地改良派。……馬歇爾本着這決策親自來華調解，要我們組織聯合政府，所以在戡亂期間，我們四平街打勝了，我主張一直打過去，蔣主席一定要我回南京就國防部長職。蔣主席對我說：『怕馬歇爾不高興。』馬歇爾壓力大，我們在長春、吉林停止了，而林彪在佳木斯，滿洲里整理，再行反攻。」

「馬歇爾要我們實行民主政治，要我們成立聯合政府，認為我們是大黨，不能壓迫小黨，實際上都是拿他們的標準來衡量我們，不知共產黨的厲害。當然我們在大陸之敗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總是不行的，鬧翻了臉不接濟我們，我們就不能解決難題。而馬歇爾沒有遠大政治家眼光，無軍事家眼光，處理中國事務犯了大錯，事實上要負很大責任。」

綜觀父親這些有關「四平街會戰」的言論，可以歸納成幾個要點：

（一）父親認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首敗在軍事，而軍事失敗，又以「四平街會戰」沒有徹底剿滅共軍，而讓林彪部隊坐大反噬，「養虎遺患」，最為關鍵。在這點上，父親與蔣中正看法相同，皆認為「四平街會戰」功虧一簣，不僅影響東北得失，甚至決定整個內戰的勝負。

（二)父親亦不便點明蔣中正下停戰令之錯誤而歸咎於馬歇爾的壓力及其對中共認識不清。但父親接着說「當然我們在大陸之失敗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總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也認為蔣當初不應過份依靠美國，受馬歇爾左右。父親曾向蔣建議，馬歇爾責怪，可以將繼續追擊的責任推到他身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父親一再向蔣中正請命，讓他留在東北，完成徹底剿滅林彪部隊的計劃，蔣始終不許，強令父親返南京。所以父親反覆說蔣主席「硬」、「一定」要他回南京就任國防部長。父親大概對這件事始終耿耿於懷的。

（四)父親不僅力主乘勝追擊林彪潰敗部隊，攻下哈爾濱、佳木斯、滿洲里等北滿主要城市，父親更建議清除東北共軍後，馬上組織三百萬民團以鞏固確保地方治安，再抽調五個美式械備師，到關內幫助北平行營在華北剿共。

（五)父親往東北督戰，四平街攻下後，父親下令繼續進攻長春，杜聿明出示中央命令，因得密報長春潛伏有六千蘇聯紅軍，令國軍不准越過遼河。父親判斷林彪部隊已經潰敗，應乘勝追擊，乃獨斷下令，嚴飭杜聿明繼續追擊，往長春挺進，並連夜飛返南京向蔣中正報告事情經過。這一段史實，在杜聿明的回憶：「國民黨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一文中，並沒有記載。讀杜文，令人得到的印象是四平街攻下後，杜聿明積極要下令進攻長春，反而是父親遲疑不決，杜極力說服父親，父親才同意追擊。我記得父親對當時的情況曾有這樣說法：父親的確三番四次詢問杜聿明，國軍是否有把握攻下長春，當杜保證有把握後，父親乃下令進攻，並對杜說，南京中央方面，由他去負責。杜文中完全沒有提六千蘇聯紅軍潛伏長春，中央下令國軍不可越過遼河之事。既然父親於一九五六年上呈蔣中正的密函中，鄭重提起這段歷史，尤其突出他「獨斷下令」的事實，蔣應完全了解當初情形，當以父親的說法可信。杜聿明的回憶文章是被俘後在大陸所

寫的，他隱去這一段，而且顛倒了一些事實，可能也有政治的考慮。但杜聿明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多所引用，所以應該澄清其錯誤的地方。事實上當初父親見機獨斷下令追擊，十分重要，因此國軍攻克四平後，才得以馬上繼續追擊，在公主嶺趕上林彪部隊，將之擊散。中央的命令，杜聿明不敢違抗，但父親是蔣中正特派到東北督戰的大員，才有獨斷行事的可能。

父親於五月十九日連夜返南京向蔣中正報告四平街戰況後，便於五月廿三日急着趕回東北。父親在「訪問紀錄」所載，蔣似乎是臨時起意要與父親一同赴瀋陽的，但既有宋美齡、張嘉璈等人偕往，可見蔣在那兩三日內已經決定要親自赴東北主持大計的了。他曾在給宋子文的函中說過：他去東北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避開馬歇爾逼他停戰的壓力。事實上他赴東北親自指揮國軍追擊，反而更坐實馬歇爾說他有意拖延停戰的指責。其實當初的上策應該是，既然父親往東北督戰已獲大勝，理該讓父親獨自再返瀋陽繼續主持國軍北進攻擊計劃、蔣自己留在南京與馬歇爾周旋，試觀日後蔣能讓馬歇爾八上廬山，為了調停疲於奔命，他在南京再應付馬歇爾兩三個星期，應該不成問題，正如父親所提，可以將責任推到父親身上。蔣與父親同赴瀋陽後，父親又數度向蔣請命，希望留在東北，完成肅清共軍的任務，如果蔣允許父親所求，東北的情況應該完全不同。

蘇聯撤軍後，「四平街會戰」國共雙方展開主力大戰，東北的問題已由國際外交轉成以軍事為主了。這時，東北的軍事主持人地位日顯重要。持平而論，杜聿明在國軍將領中，算是一位相當傑出的將領，後來因為東北戰爭失敗，徐蚌會戰全軍覆沒，而遭受到各種攻擊，且被美國人在白皮書中斥為「庸將」，但他的老上司關麟徵說了公道話，他稱贊杜聿明精明強幹，「論學術能力，均不失為是一個好將領。」　但他也認為杜作戰經驗不足，指揮大兵團與共軍作戰的經驗尤其不足，「一個只能挑一百斤的人，卻要他去挑一千斤，這又焉能不垮不倒？」中共方面既然打出共軍中第一張王牌林彪來，國軍也應該推出一位與林彪旗鼓相當的將領與之對抗。而且杜聿明與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因派系不同，熊為政學系，二人意見相左。杜時時受掣於熊。如果父親能留在東北主持軍事大計，這些都不成問題了。父親是國防部長，職位高於熊式輝，而且北伐時，父親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指揮過熊。如果讓父親坐鎮東北，指揮杜聿明下面廖耀湘、陳明仁、孫立人這些國軍中的虎將，以當時國軍之氣勢及軍備優勢，「將林部殲滅或驅出東北境外」的可能性極大。父親一定會命令新一軍繼續追擊，攻下哈爾濱，再取齊齊哈爾、佳木斯、滿洲里等北滿城市，將共軍徹底趕出戰略地區。或謂共軍善於遊擊戰，精於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但遊擊戰的首要條件是

具有廣大農村人民的支援，但一九四六年的夏天，共軍並沒有這個條件，林彪部隊還來不及在東北建立根據地，幹部組織的群眾運動還未能深入。共軍當時，並未得到東北人民的支持，而且北滿地帶苦寒，如得不到蘇聯的援助，共軍很難生根。

軍事平定後，父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治理東北的計劃，那就是「編三百萬民團、自動保衛地方。」父親本來就反對戰後貿然裁軍，尤其反對解散各地方遊擊隊及偽滿軍。父親這項組織民團的計劃，一定會將東北地區的遊擊部隊及偽滿軍統統收編。後來陳誠下令解散東北三十萬偽軍，這些訓練有素的軍隊投到林彪部下，共軍如虎添翼，是後來共軍在東北得勝的主要因素之一。父親在三零年代治理廣西時，便以訓練廣西民團著名。父親又當過八年軍訓部長，練兵有豐富經驗。如果讓父親在東北組織訓練一支三百萬的民團，這些民兵深入東北各地農村、保護地方，對付共產黨的遊擊隊，將是一股勁敵。而且共軍幹部下鄉展開土改、組織農民，也將遭遇這些民兵的抵抗。父親計劃中的三百萬的民團，將是穩定東北的一股重要力量。後來東北國軍漸漸被孤立，最後困守在幾個大城，被共軍包圍吃掉，就是因為國民黨在東北的行政系統未能夠組織動員東北人民，輔助國軍。軍事與行政系統，各行其事，不能相輔相成。父親建議組織民團，是頗有遠見的一項計劃。

父親下一步計劃是，東北情況穩定後，抽調五個美械裝備師，入關幫助北平行營打華北聶榮臻部下的共軍，形成重點使用，父親認為如此「戡亂大局或可改觀。」

當然，這一切假設端看蔣中正當時是否願意讓父親留在東北支持大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李宗仁對這段歷史有這樣的看法　：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會戰的主要劃策人，林彪敗退之後，白氏即主張乘勢窮追，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當時負責東北軍事指揮的杜聿明雖同意白氏的主張，但未敢專斷，陳明仁則認為戰事瞬息萬變，時機稍縱即逝，應立刻揮軍[74]窮追，結果乃聯銜電蔣。不意所得覆電竟是『暫緩追擊』，共軍因此能從容北撤。前敵將領得此覆電，無不頓足浩嘆，白崇禧亦頹然而返。

其時縱是嫡系將領如陳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輝，均不了解蔣先生不許乘勝追擊，任林彪所部安然脫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數而暗笑。我知道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

可打一全勝的使，他也寧可不要。

蔣先生就有這樣忌賢妒能，寧饒敵人，不饒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說出去，一般人是不會相信的，但追隨蔣先生有年的人一定會拍案叫絕，認為這是一針見血之談。」

李宗仁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可能有偏頗，論述細節也有錯誤的地方，但他認為蔣中正對父親有所顧忌，不願意授權父親在東北主掌大局，是極有可能的。這又牽涉到蔣氏與父親多年來一貫錯綜複雜的關係模式了。蔣氏相信父親的軍事才能，所以才會派他去東北督戰、處理危機，但一旦父親在東北指揮蔣氏最心愛的黃埔系王牌軍得心應手，打了大勝仗後，還想留下來，總攬東北大權，這恐怕就不是蔣氏心甘情願的了。蔣極重視東北，所以才會派他至為親信但才能膽識皆屬平庸的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對他忠貞不貳的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熊、杜等人對蔣自然言從計聽，不敢有所違抗。父親就不那麼好駕馭了。父親「獨斷下令」，進軍長春，是有違中央蔣中正的命令的。父親返南京向蔣報告下令進軍長春這件事時，蔣「當場不置可否」，「很沉重的樣子」，「『唔！』『唔！』連聲」，蔣這些反應似乎有點不悅，他對父親一向敢作敢為的獨斷作風，恐怕並不很欣賞。蔣不放心讓父親一個人回轉東北去繼續指揮，所以才與父親同往瀋陽，而且將指揮軍隊的大權拿了過來，親自指揮國軍北進。由父親的「訪問紀錄」中看來，父親自與蔣中正同赴東北後，東北的軍事大計，父親似乎就無權作主了。父親在長春向蔣請命，希望留在東北，繼續指揮國軍北進，蔣吩咐父親：「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蔣的言外之意是否在告訴父親：東北的軍事已有杜聿明負責，不必你越俎代庖了。

一九四七年夏秋之交，林彪部隊早已坐大反噬採取攻勢，幾度南下攻打四平、吉林、長春，東北國共雙方形勢優劣逆轉，熊式輝在東北人士攻擊下，勢在必撤。蔣中正一度有意要李宗仁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因李宗仁先前曾向蔣請假赴美就醫，當時蔣的方案是：李宗仁調任後，先派父親代理東北行轅主任兩個月，以便李赴美就醫。李宗仁以東北形勢仍照當時辦法甚難挽回，固辭不就，因而改派參謀總長陳誠就任 。當時蔣中正一定已經看出當初沒有接納父親的請求：讓父親在東北徹底剿共的錯誤，希望父親再度出馬挽救東北局面。陳誠上任後，共軍一連發動攻勢，國軍吃了幾個大敗仗，使吉林長春四平街完全陷於孤立。父親看見東北形勢急速惡化，乃向蔣中正建議：應及早放棄吉林長春，而將東北國軍主力集中於瀋陽以南，[75] 打通營口及錦州之線，使國軍補給不致中斷，而進攻退守，亦可運用自如 。但蔣氏又未接納。翌年，東

北各孤立據點遂為共軍個別擊破，最後四十七萬國軍精銳盡喪敵手。

一九四八年元旦，國民黨中央政府頒給父親「二等寶鼎勳章」，褒獎父親：[76]

「抗戰甫告勝利，共匪盤踞東北蔓延滋長，杜總司令聿明所部奉令剿伐四平街林彪匪部，旋於三十五年冬銜命親赴前線督師，一舉掃盪四平街匪軍，繼進軍長春吉林，餘匪望風披靡，潰不成軍，於卅七年元旦奉頒二等寶鼎勳章。」

這枚遲來的勳章，事後看來，對父親幾乎是一種諷刺。蔣中正終於認清父親在「四平街會戰」立功的重要性了，但已太遲。

父親在一九五六年上蔣中正的密函中，形容當年在東北沒有追擊林彪部隊，任其坐大反噬，是「養虎遺患」，其為患之烈，恐怕沒有人比父親體驗得更深刻、更痛切了。林彪在「四平街會戰」戰敗後，嚐到慘痛教訓，利用停戰得以喘息的機會，馬上改弦更張，以哈爾濱、佳木斯等地為根據地，重新整軍練兵。一九四六年底共軍已增至三十六萬，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勢前後：增至五十萬，而至一九四八年冬「遼瀋決戰」前，因收編偽滿軍，暴增至一百多萬　。「遼瀋決戰」，林彪部隊將國軍四十七萬最精銳的軍隊，全部吞噬。擄獲國軍美式軍備二千輛卡車、一百五十輛裝甲車，七十六輛坦克車，還有數量龐大的槍枝彈藥。得到這些美式優良軍備，林彪的部隊已經脫胎換骨成為一支強大無敵百萬之眾的「四野」了。「遼瀋決戰」後林彪統率「四野」迅速入關攻打平津，傅作義不戰而降，一九四九年，一月卅一日林彪軍隊入北平。四月，林彪率部沿平漢路南下，當時他身任中共華中軍區司令員，兼華中局書記。同時，父親亦任職華中剿匪總司令，坐鎮武漢，與林彪再度交鋒。三年前，「四平街會戰」，林彪是父親手下敗將，而今捲上重來，而且剛剛在「遼瀋」、「平津」兩大戰役大獲全勝，其氣勢自不可同日而語，而國軍「徐蚌會戰」慘敗，六十萬大軍覆沒，共軍渡江，上海南京相繼陷落，國軍士氣已經全面崩潰。父親華中的守軍約二十五萬人，此時又因蔣中正下野，將國庫黃金運往台灣，軍餉困難，而且黃埔系的將領如宋希濂之流，驕兵悍將，竟不聽指揮。父親此時，左支右絀，情況至為窘迫，自然無法抵擋林彪強勢部隊的進攻，五月十七日武漢失陷。父親率軍入湖南，節節抵抗；七月，因程潛、陳明仁叛變投共，長沙陷落，父親的軍隊退守衡陽，在衡陽附近青樹坪父親佈下埋伏，林彪五萬軍隊中了陷阱，大敗而退。這便是國軍的「青樹坪大捷」，也是「徐蚌會戰」後國軍最後的一次勝利，衡陽因此得防守三月，但共軍攻勢，終不可擋，林彪部隊直下粵、

桂，十月十四日佔廣州。父親率領他幾個廣西子弟兵團回家鄉做最後抵抗，但此時早已軍心渙散兵無鬥志了。十一月廿二日桂林陷落，十二月四日，南寧失守，父親撤離大陸，飛往海南島，手下全軍覆沒。翌年四月，林彪軍隊攻佔海南，大陸淪陷。

父親身經北伐抗日，屢克強敵，贏得諸葛盛名，但最後竟敗在林彪手裏。而這一場慘痛失敗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當初「四平街會戰」，蔣中正肯接納父親建議，徹底剿滅林彪部隊。父親追憶這段歷史，能不「痛心疾首」。一九四八年冬，東北最後決戰是由蔣中正親臨指揮的，他眼看着林彪部隊將他最心愛的數十萬國軍精銳一一吞噬，他心中的感受恐怕與父親一樣痛切，所以才會得出他親自頒發的第二次停戰令是「東北最後失敗惟一關鍵」的結論來。

結論

東北戰爭的勝負，對整體內戰的影響是有決定性的。首先國軍方面在東北被困住四五十萬軍隊，因東

北地區偏遠，軍需補給，消耗驚人。戰後國民政府的支出，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是用於軍事，而軍事預算中，東北戰爭消耗了大半。最後長春等城市被圍，只有靠空投救援。一九四八年當時行政院長翁文灝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都用到東北去了。戰後國民政府的經濟危機本來就很大，東北戰爭的消耗，火上加油，是促使國民政府經濟崩潰的直接原因之一。又因四、五十萬最精銳的國軍困守東北，華北的軍隊不敷使用，防務空虛，等到林彪部隊一入關，華北守軍便無法抵擋，平津遂告陷落。東北戰略經濟地位如此重要，而國軍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後竟全軍盡沒。東北戰爭的失敗，對當時全體國軍軍心士氣震撼至鉅，發生骨牌效應，林彪大軍一入關，也就是國軍全面崩潰的開始。林彪部隊能夠長驅直入山海關，一直打到海南島，席捲大陸，成為國軍第一號勁敵，亦就是國軍東北敗守的結果。

「四平街會戰」後，約有四個月東北國共軍之間，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在這個期間，如果東北行營，能夠勵精圖治，以政治輔助軍事，組織民眾、建立地方勢力，如父親所建議，組編三百萬民團，以保地方，如此亡羊補牢，最後國共兩軍開戰時，國軍或許不致陷於孤立，而被共軍各個擊破。當然這些措施的首要條件就要看東北行營是否領導有方，組織健全了。答案又是否定的。

歷來檢討國民黨在東北失敗的文獻，國共雙方多有論述。國民黨方面，尤其是東北人士，大都認為東北行營的領導人一開始便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戰後東北軍事、政治、外交各種情況複雜，領導東北行營的人選，或在軍事上應是一位能夠運籌幃幄，精通韜略而又聲威服眾的上將人材，或在政治上能夠號召東北人民，喚起群眾組織群眾的領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曉國際事務，尤其能對付俄共，能知進退的外交家。這樣的人選，本來難尋，而蔣中正卻偏偏選中了政學系要角的熊式輝。熊氏本身並不具備這些條件，因被譏為「不文不武」。熊氏雖然出身保定、日本陸大，早年參加北伐，但並無顯赫戰功，在國軍中聲望不高，東北黃埔系的將領並不服他。尤其他親自指揮五十二萬之第二十五師攻打本溪，損兵折將，大敗而歸，這是他唯一一次親自指揮的戰役，卻栽了跟斗，杜聿明等頗為鄙夷。政治上，熊氏除了就任十年江西省主席，亦無過人政績，尤其對東北人民，完全缺乏號召力。抗戰期間，熊氏曾出任軍事代表團團長，派駐英國，熊氏英語不精，與國務院甚少接觸，後又因公開演講指責美國未實踐援華諾言，引起美國政府不快。當時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蔣中正面前還曾告了熊一狀。熊氏的外交才幹，由此可見，後來在東北應付蘇聯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遂一籌莫展。據說當初是由於政學系領袖張群的大力推薦，熊式輝才得到東北行營主任的職位。國民黨內政學、黃埔、CC的派系鬥爭，又在東北重演，熊式輝對黃埔系的「天子門生」既無法控

制，又排斥搞黨務的CC人員。於是弄得黨、政、軍三頭馬車，各不相屬。熊式輝在東北主政近兩年，在這段關鍵時刻，奠基工作沒有做好，所以才給予共產黨可乘之機。連在江西受過他照顧的東北外交特派員蔣經國也批評熊「頭腦頑固」，認為他是「一個老官僚」 。當時中央黨務特派員，東北人上齊世英，亦遭到熊的排擠，他對熊有這樣的批評 ：

「我看熊式輝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聰明，善耍把戲，對東北根本不了解。那時中央調到東北的軍隊，除孫立人而外都是驕兵悍將，熊一點辦法都沒有，[78]而熊又不能與杜聿明、孫立人合作。中央派到東北去的文武官員驕奢淫逸。看到東北[79]太肥，貪贓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對東北人還有點對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聲載道。」

東北情況惡化，熊式輝窮於應付，受到東北人士猛烈攻擊因而求去。陳誠繼任，意氣至豪，聲言不許共軍有第六次攻勢。陳雷厲風行，極思有所作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尖軍心民心。」 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死守四平街有功，國民政府頒以最高青天白日勳章。陳明仁卻以大豆案被陳誠撤職查辦，據說陳明仁返南京將軍服焚掉，聲言要去國府路擺攤販賣青天白日勳章。陳明仁立大功而遭懲罰，對當時軍心打擊甚大。陳誠任內，一九四七年共軍發動秋、冬攻勢，國軍一連大敗，損失十萬人 ，陳[80]誠下台。一九四八年四月間，南京開國民代表大會、東北代表群情激憤，要求蔣中正主席效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以謝國人 。

陳誠在參謀總長任內所做影響極大的一件事，便是解散東北三十萬偽滿軍，共軍將這[81]些訓練有素的軍隊收編後，如虎添翼。論者多以為戰後不收編東北偽滿軍善加利用，是國民黨一大失策。東北人士多持此論，例[82]如曾為東北國大代表的于斌主教，便有這一段沉痛的檢討 ：

「我們在大陸的失敗，始於東北的失敗，而東北的失敗則非純國軍在戰場的失敗，實為接收失敗。日本竊據東北十四年，曾訓練不少偽軍，其在日本控制時，固為偽軍，當其回到祖國時，則為愛國青年，在光復之初，一心等待收編，為國效力，結果卻大部為共匪裹脅而去，[83]本已被國軍擊潰的林彪匪部，得此補充力量，加以蘇俄移交之日軍裝備，短期內即匯聚成一大股有力匪軍，數量遠過國軍，人少力分之國軍，縱勇敢善戰。至此已無能為力。東北失敗後，匪軍源源入關，遂導致整個大陸的淪陷，……」

東北籍立法委員齊世英也有相同的結論　：

「中央在東北最大的致命傷莫過於不能收容偽滿軍隊，迫使他們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東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蘇軍俘來的日軍和偽軍的武器組成第四野戰軍，一直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據說一直到現在，湖廣一帶的地方官不少是東北人，都是第四野戰軍。我們的人自己不用給人用，說來實在痛心。」

出處：《素巢文學・失去的飛碟》，第 1 期；

一九四八年二月，衛立煌臨危受命勉強上陣，但東北大勢已難挽回。而衛立煌與蔣中正對於東北國軍的戰略又有嚴重的分歧。衛主守，蔣主攻。一九四八年秋，最後「遼瀋決戰」林彪大軍南下，「錦州之役」，蔣中正親往東北指揮，下達命令，衛立煌竟抗拒不從，兩人發生矛盾，上級意見不一致，前線指揮官無所適從。先是，十月十四日，錦州陷落，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以下七萬人被俘。蔣中正嚴令衛立煌反攻，但衛認為錦州已陷，派軍往救，恐有被共軍圍剿的危險，兩人曾為攻或守發生爭執，最後終於派廖耀湘兵團由瀋陽西進，但旋即廖兵團被圍，十餘萬人覆沒。同時被圍困半年的長春亦因滇軍第六十軍叛變，十月二十七日，另一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以下六萬餘人被俘。十一月二日，瀋陽不守，衛立煌出走，東北全部盡入共軍手。

東北三任行營主任，都未能做到軍政統一，上下齊心，開創出一個振奮局面來。

父親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向當局提出處理東北問題的全盤戰略計劃：剛勝利時，父親建議，先固平、津而後出兵關外，既已出兵，父親則贊成乘勝追擊，徹底剿清共軍，最後良機已失，敵軍坐大，父親則建議放棄長春、吉林，將國軍撤至瀋陽以南，據錦州而守。可惜父親的建議都未受蔣中正採納，以致最後東北局面進退尖擄，該攻的時候不攻，該守的時候不守。蔣氏在處理東北危機上，竟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猶豫不決，舉棋不定，而終誤大局。

反觀共軍方面：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在四平街大敗後，竟能在半年多的期間，恢復元氣，重整旗鼓，於翌年初一月便開始反攻，「一下江南」，越過松花江，襲擊國軍。共軍能於如此短期內恢復戰鬥力，亦是證明其韌性之強。

一九四六年「四平街會戰」後，中共東北局於同年七月馬上召開會議檢討得失，並訂立影響重大的「七七」決議，制定東北長期鬥爭方針。「七七」決議的重要措施便是建設根據地，立即派遣一萬二千幹部下鄉，展開群眾運動，實行清算地主，重分土地。中共在東北本來並未獲得人民支持，東北局檢討四平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共軍在東北尚未建立根據地。中共本來擅長組織群眾，在短期內，便能控制住東北廣大農村的人口，建立起根據基地來。由此，林彪部隊的兵源人力，才可由東北農村取之不盡。林彪部隊在兩年多期間，竟能數倍成長，即由於大量吸收東北農村子弟，而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野戰軍。

四平戰敗，彭真被清算，失去了東北局書記職位，由林彪接任，兼掌軍政大權。東北局由此軍政統一，政治措施，完全配合軍事行動。中共東北局本來人材濟濟，在林彪強而有力的領導下，步步為營，終能轉敗為勝，將劣勢逆轉為優勢。時間對共軍有利，在四平街會戰後至「遼瀋決戰」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中共東北局，充份利用。

一九四六年初夏的「四平街會戰」對整個東北戰爭的影響是如此之鉅，但歷來深入研究這一戰役前因後果的專著卻少之又少。探其原因，國民黨方面由於四平之役下停戰令是蔣中正本人鑄成的大錯，不便深究。當年參加過東北戰爭的國軍將領如趙家驤等人寫回憶錄時，這段歷史也只能點到為止。至於被俘的國軍將領如杜聿明等，又有了另一種顧忌，對於共軍的慘敗情況，不能照實寫，只好曲筆帶過。中共方面，「四平街會戰」事實上是國共內戰中頭一等大敗仗，當然不願多加宣揚，提到四平兵敗，林彪部隊狼狽竄逃的情形，一律用「主動撤退」遮掩過去。只有許多年後像羅榮桓等人的回憶錄才偶而說幾句真話。至於國軍當時沒有進佔哈爾濱，中共的說法通稱國軍已無力進攻，事實上毛澤東已下令撤守哈爾濱則從來不提。死守四平，造成共軍損失慘重，是毛澤東親自下令犯的錯誤，追究責任太過敏感，於是只有把彭真拋出來替罪，「文革」的時候，清算他的舊帳。

至於外國學者，對「四平街會戰」的來龍去脈及其重大意義有深刻了解的：亦屬鳳毛麟角。美國學者列文教授(Steven I. Levine)對戰後東北問題頗有研究，他的專書《勝利的錘煉場》(The Anvil of Victory)探討中共東北局如何慘淡經營，在東北贏得最後勝利的過程。但他論到「四平街會戰」，對林彪部隊潰敗的實況，了解並不深入，因而得出即使國軍拿下哈爾濱也「不太可能逼退或殲滅善於閃躲的共軍」之結論來。李格中校(Robert B. Rigg)當時是美國大使館武官助理，他曾在東北目擊「四平街會戰」經過，後來他將東北戰爭

的歷史寫成《中國紅軍》(Red China's Fighting Hordes)一書，此書常被外國學者引用，李格雖然認識到「四平街會戰」的重要性，並認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的停戰令「不僅是東北戰爭亦是整個內戰的轉捩點」，但他也誤以為林彪部隊能夠「主動」撤離四平、長春，從容北退。當初美國政府對東北四平一役的情報的確有誤，難怪馬歇爾硬是不肯相信國軍已將共軍主力擊潰的事實。其他外國學者撰寫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對「四平街會戰」有清楚認識的並不多，連具有權威性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其中「民國史——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論述到東北戰爭這一段，對國軍在四平一役得勝的軍事意義，也大大的低估了。美國學者中，對「四平街會戰」比較有見解的，迄今似乎只有兩位。一位是衛特塞(Carroll R. Wetzel)他的博士論文《虎口餘生：林彪及東北四野軍》(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對「四平街會戰」的前因後果有相當詳盡的論述，但此論文成於七十年代初，中共方面許多資料如毛澤東及林彪之間的密電尚未公諸於世，所以對於共軍的潰敗實況未能深入探討。另一位是吉林教授(Donald G. Gillin)，他除了撰寫專文〈蔣介石與馬歇爾：一九四六年四平街之災禍〉(Chiang Kai 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ch 1946)論述這段歷史外，他在編撰張嘉璈日記《東北最後的機會》(Last Chance in Manchuria)的長序中，對「四平街會戰」的得失，有相當深入的分析，他如此結論[85]：

「國軍停止追擊，未繼續進佔哈爾濱，顯示東北蔣氏的軍隊從此江河日下。雖然數月後戰事又起而且持續兩年，東北國軍再也無法重獲一九四六年初夏他們享有的優勢。最後，那個夏天在該地所發生的事（指蔣氏下令停戰），不僅令國軍在東北失去一次軍事勝利的機會，最後並致使國軍在中國全盤潰敗。」

注釋：

Donald Gillin,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Hoover Institute Press, p.21"

Tsou Tamg, "Amenca's Failure in China", p.306.

①

黃克誠，〈從蘇北到東北〉，《遼瀋決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三二。

②

同 3 ，頁一九零。

③

張正隆：《雪白血紅》，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五九。

④

同 5 ，頁四零。

⑤

同 5 ，頁四一。

⑥

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遼瀋決戰》，頁八四。

⑦

黃克誠，〈從蘇北到東北〉：劉漢等，《羅榮與元帥》，解放軍出版社。

⑧

大溪資料，〈國共協商及共軍叛亂卷〉，頁二七九—二八零。轉引自梁敬錞，

⑨

《中美關係論文集》，聯經出版公司，頁一三二——一三三。

⑩

Albert C. Wedemeyer, "Wederneyer Reporisl", Henry Holt & Company, 1958, p.346.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九專著，頁二零一。

⑪

同 8 ，頁八四。

⑫

《中美關係白皮書》，頁二八二。

⑬

同 11 ，頁二七零。

⑭

《總統　蔣公太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一一四。

⑮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一九零。

⑯

⑰ 同 17，頁一五九。

⑱ 同 5，頁一六五。

⑲ 同 6，頁一六六。

⑳ 同 3，頁一九六。

㉑ 同 14，頁四零。

㉒ 同 16，卷六（上），頁一一四。

㉓ 同 16，頁一一五。

㉔ 同 11，頁二二五。

㉕ 杜聿明，〈戰役前國民黨軍進攻東北概況〉，《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九八五，頁五五一。

㉖ 同 26，頁五五三。

㉗ 同 26，頁五五三?四。

㉘ 同 26，頁五五五。

㉙ 台灣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當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曾親口告訴筆者當年父親抵瀋陽時，東北將領士氣人振的情況。

㉚ 同 16，卷六（上），頁一五零。

㉛ 同 16，頁一五一。

㉜ 同 16，頁一五三。

㉝ 《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編，一九四九年，??月，頁??。

㉞ 轉引自《雪白血紅》，頁一七四。

同 3 ，頁一九九。

㉟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九日，林彪致東北局電，《雪白血紅》，頁一七零。

㊱
"Civil War in China, 1945-50", Taipei, p.24 。

㊲
同 8 ，頁九零。

㊳
羅榮桓，〈對東北解放戰爭形勢與任務的分析和部隊思想工作〉，《遼瀋決戰》（上），頁二九。

㊴
Ray Huang（黃仁宇）， "Some Observations on Manchuria in the Balance, Early 1946", Pacific Historical

㊵ Review., May 1958, p.66 。

Ray Huang（黃仁宇）， "Memoirs" V12, pp.25 、 30 。轉引自 Gillin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p.50 。

㊶
同 5 ，頁一八六?七。

㊷
同 5 ，頁一八七。

㊸
劉漢等，《羅榮桓元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六六八。

㊹
陳沂，〈四平保衛戰〉，《遼瀋決戰》（上），頁二二八。

㊺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頁二二四。

㊻
同 5 ，頁一七二。

㊼
同上，頁一九一。

㊽
同 5 ，頁一九五。

㊾
同 46 ，頁二三五。

㊿
同 5 ，頁一九六。

⑤1 同 5 。

⑤2 同 46 ，頁二五零。

⑤3 許逖，《百戰軍魂??孫立人將軍》（下），懋聯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零三。

⑤4 同 5 ，頁二零二。

⑤5 同 12 ，頁一四六。

⑤6 見一九五零年國防部出版之《剿匪重要戰役之追??與檢討》，內載湯恩伯，胡宗南等十七位國軍將領之檢討。

⑤7 同 12 ，頁一四七。

⑤8 同 16 ，卷六（上），頁一五一?二。

⑤9 同 16 ，頁一六五。

⑥0 同 16 ，頁一六八。

⑥1 Donald G. Gillin, "Chia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 Calastrophes of Szeping-Chieh, 1946" Carroll R. Welzel Jr., "From the Jaws of Defeat: Lin Piao and the Fourth Field Army in Manchuria."

⑥2 同 16 ，卷六（上），頁一一五。

⑥3 同 16 ，頁一五一。

⑥4 同 16 ，頁一六六。

⑥5 以下數處所引蔣中正之日記，皆出自《蔣公太事長編初稿》，卷六（上）。

⑥6 同 66 ，頁六三。

⑥7 同 12 ，頁一四六。

⑱ 同 12 ，頁一四七。

⑲ 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初稿》，????，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七三八。

⑳ 《趙家驤將軍詩文集》，台北，一九六零年，頁四一五。

㉑ 一九五六年，父親在台灣發覺??車被國民黨特務跟蹤，乃呈??蔣中正，詰問由來，並表明心跡。

㉒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香港，宇宙出版社，一九七??年，頁一九九。

㉓ 《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五八九一九零零。

㉔ 《李宗仁回憶錄》，頁五七一，黃旭初〈廣西與中央??餘年來悲歡離合憶述〉（第二十五節），香港，春秋雜誌。

㉕ 隱士（程思??），《李蔣關係與中國》，香港，自由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九零。

㉖ 《遼瀋決戰》（下），頁六八五。

㉗ 張令澗：《我在蔣介石??從室的日子》，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九五，頁三四五。

㉘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訪問：沈雲龍、林泉、林思??，台北，中央研究院，一九九零年，頁二六九。

㉙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七七四。

㉚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遼瀋戰役親歷記》，頁四。

㉛ 同 81 。

㉜ 陳嘉驥，《認識東北》，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七零，頁二。

㉝ 同 79 ，頁二七零。

㉞ 同 1 ，頁五二。

㉟